REMEMBRANCE

記憶

ISSN: 2687-9964（印刷版/Print）
ISSN: 2687-9972（电子版/Ebook）

第376期/2025

文革六十年祭：十年十部书

政治大词的漂移

四川文革史·导言

文革史家周良霄、顾菊英夫妇

《记忆》第 376 期

【独立评论】

文革六十年祭：十年十部书（2016-2025）/老 方

【思想文化】

政治大词的漂移——打工者状告资本家/七尺从天

【历史研究】

四川文革史·导言/周孜仁

【评论】

读李辅《寸心言不尽》琐记/孙 涛

《四川文革史》读后/袁庭栋

一份来自六十六年前的检讨交代和整风小结/谢阳秋（澳）

【序跋】

《地方文革史丛书》总序/啟 之

《四川文革史》跋/周孜仁

【人物】

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夫妇的文革研究/梁幼志

【书信】

许良英、李慎之谈无产阶级专政和“三个代表”/续霜红 选注

【编读往来】

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向继东谈《四川文革史》

【本刊声明】

【独立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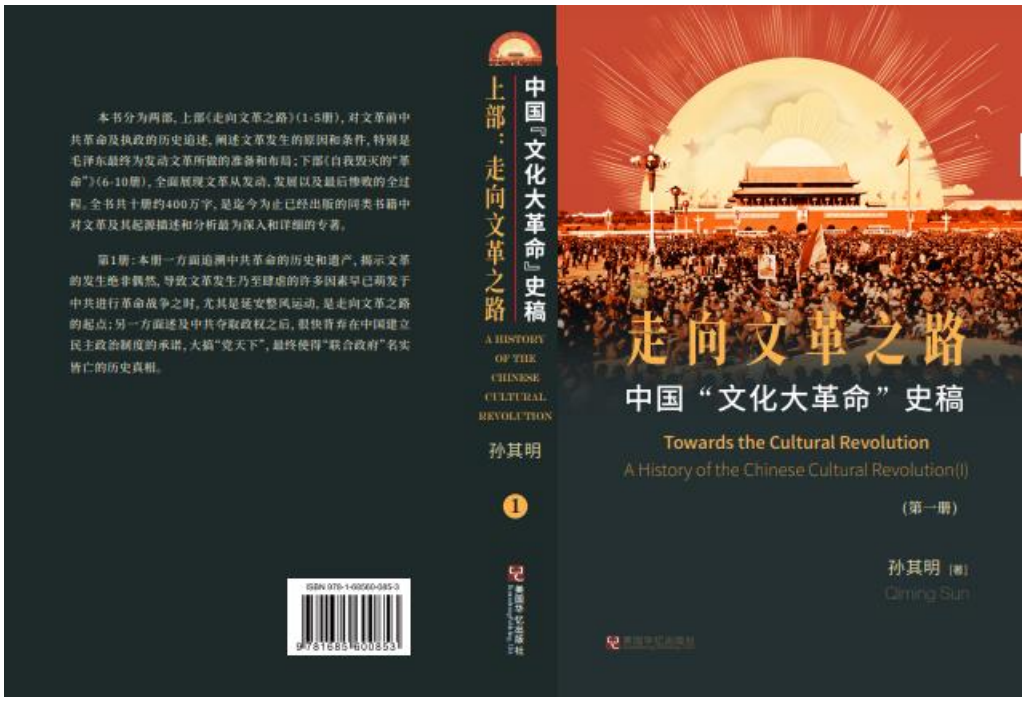
文革六十年祭

十年十部书（2016—2025）

老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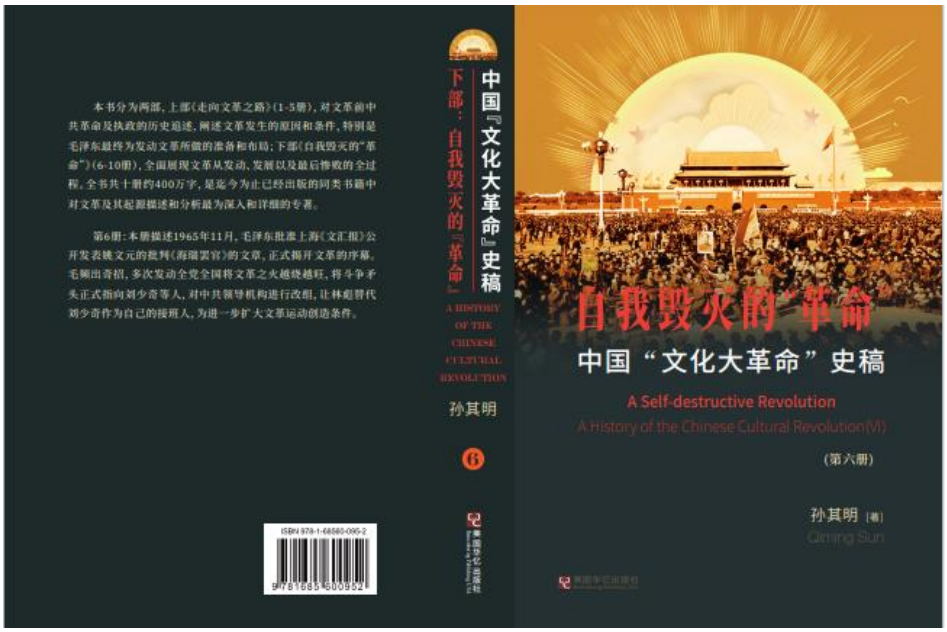
2016 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2026 年是文革发动六十周年。五十周年以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全二卷）和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全二卷）划上句号。六十周年以赵园的《非常年代》（全二卷）和启之主编的《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全四卷）拉开序幕。这十年间，以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为主的写作队伍，顶查抄，战约谈，不畏年老疾病，向历史交上了亲历者的答卷。文革通史（文革十年史）、文革阶段史/分期史、文革专题史、文革地方史（省、市）、文革单位史（大学、中学、兵团）、文革回忆录（口述）、文革资料汇编等领域均有不俗表现。兹择十部学术著作简述之。

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稿》（全十卷）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3 年出版。中共党史专家孙其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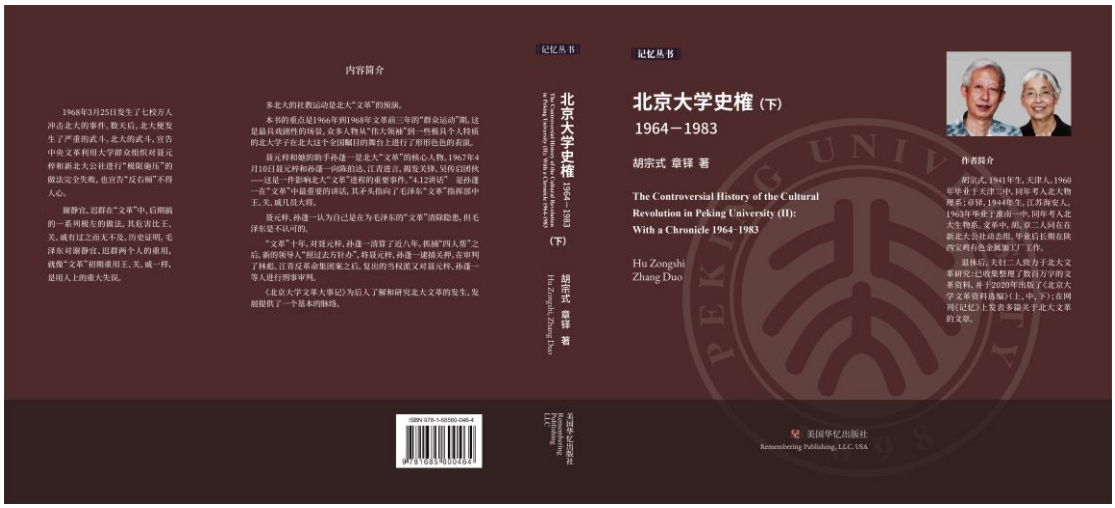


此书是继严家祺、王年一、麦克考法尔/沈迈克、杨继绳之后出版的篇幅最

长的一部文革通史著作。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至五卷，写的是延安至四清，即作者定位的“文革的准备期”，副书名是“走向文革之路”。六至十卷写的是文革十年，副书名是“自我毁灭的革命”。此书是迄今为止已出的同类书籍中，对文革及其起源描述和分析最为深入和详细的专著。也是在思想观念上，对 1981 年第二次《历史决议》有重大突破的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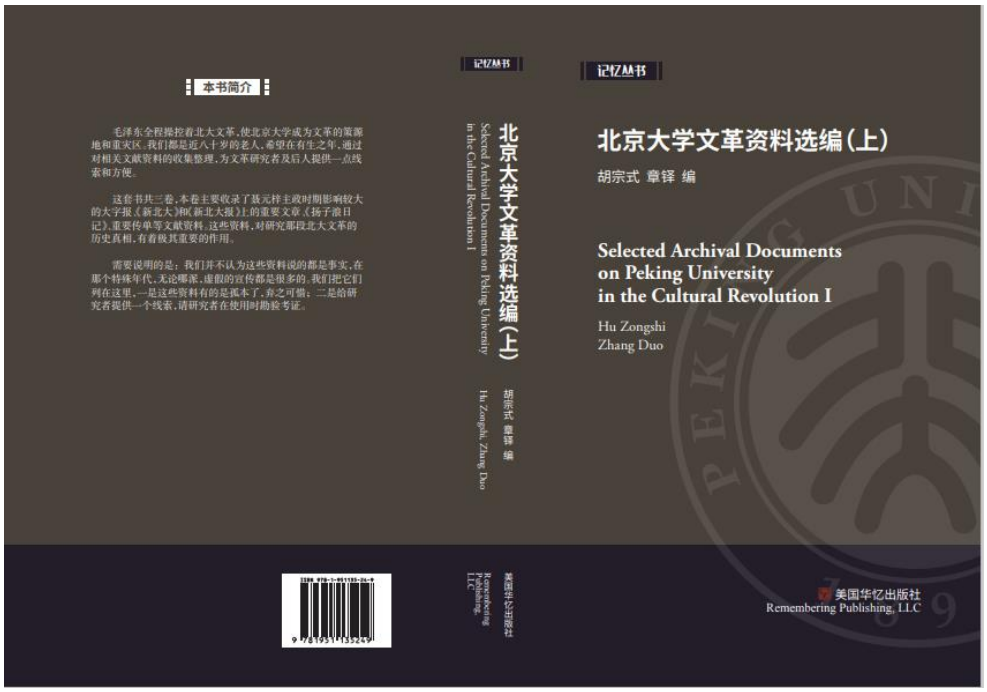


二、《北京大学文革史榷》（全二卷）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0 年出版。北京大学老五届胡宗式、章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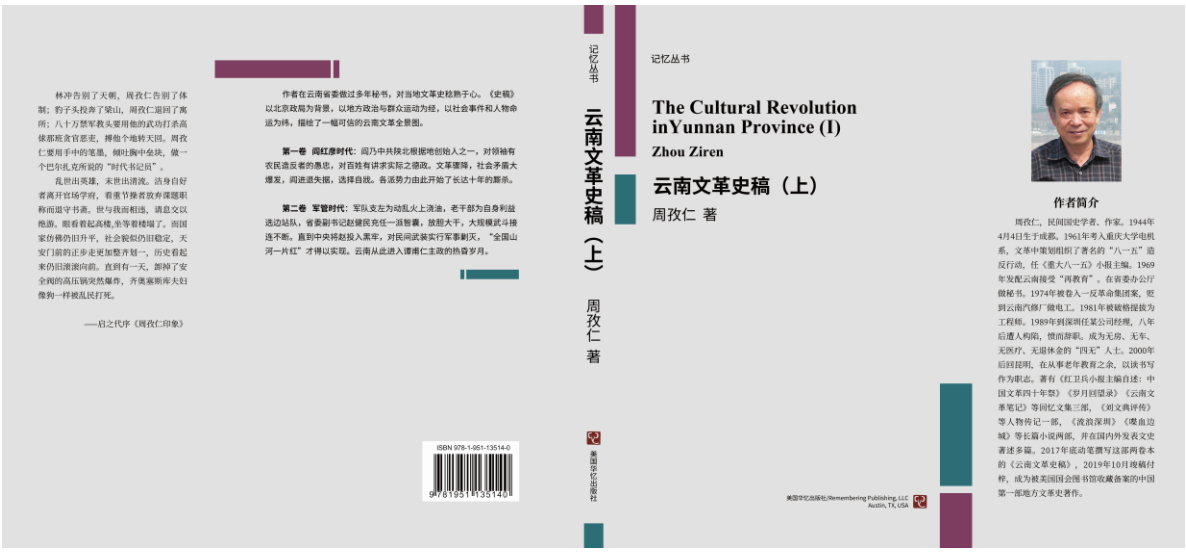


这是世上第一部高校文革史。书后附有“北京大学文革大事记”。在此书之前，两位作者编辑出版了《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续编》（共四卷）、《聂元梓遗稿》和聂元梓回忆录《在文革的漩涡中》等著作。在

搜集、整理、编辑这些书籍的同时，两位作者还撰写了多篇论文和评论，以及一些纪念文章。两位作者在文革中都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其所著所编容或有派别倾向，但他们对北京大学文革历史的叙述是建立在丰厚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以充分有力的证据指出了由副书记王学珍挂帅，校党史研究者王效挺等人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歪曲。



三、云南文革史稿（全二卷），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3 年出版。周孜仁著。



此书是继第一部中国地方史（启之的《内蒙古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

动》）之后，正式出版的第二部中国地方文革史。作者周孜仁（1944 年—）1961 年入重庆大学电机系，1966 年参加文革造反，任《重大八一五》主编。1969 年分到云南，在省办公厅做秘书。2017 年第一次地方文革史研讨会上，周先生主动承担了云南文革史的写作。2019 年 10 月竣稿。此书问世后，在云南民间不胫而走，读者纷纷对作者替云南留史表示感谢，复制《史稿》书面文本请作者签名者众，学界人士亦待之以史学大家。此书问世之前，作者在海外出版过《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岁月回望录》《云南文革笔记》，并有《三重奏》《野山地的传说》《饥饿年代的饮食文化》等多种作品在国内刊物载出并获奖。

四、四川文革史（全三卷）美国华忆 2025 年出版。周孜仁著。

2019 年周先生完成《云南文革史》后，即投入四川文革史的资料搜集和写作之中。2020 年底，作者突发“腔隙脑梗”。病中继续伏案研读，至 2025 年竣稿。“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胡适此言，适用于作者。

当代人著文革史，不但需要才学，更需要胆识。作者兼备才学识胆和常人没有的坚韧。云南文革史和四川文革史的出版，再一次证明，信史在民间，不在府衙，史家在高校，更在闾巷。此书一卷甫出，蜀人争相索阅，北国青年，南方学人纷纷致信作者。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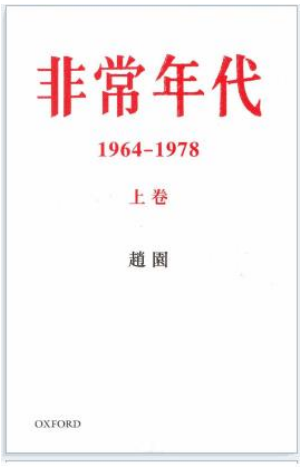
五、山西文革史稿（全二卷），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5 年出版。石名岗执笔，李辅修订。

《山西文革史稿》的前身是《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与反思》，此书是在多名文革亲历者的回忆、研讨基础上，由石名岗先生执笔，历时五年完成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革史著作。2015 年在太原自印，被查抄。2017 年第一次地方文革史研究会上，主持人提出修订意见。2022 年 7 月石名岗先生抱病修订，完成导论后，不幸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因骨髓癌病逝，修订之事由耄耋之年的李辅先生毅然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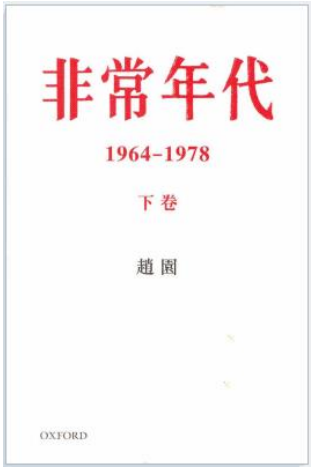
本书上卷（1966——1968）包括导论和前 1-7 章，导论论证了文革必然发生的原因，分析了山西为什么夺权最早，夺权者分裂最快的原因。第一章至第七章叙述了当权派的内斗，社会两派文攻武卫的乱象。

下卷（1969-1980 年代）8 一 16 章记述了九大至文革结束的十余年间山西高层的正邪之争，和造反派对文革的抵抗——谢振华抵制极左，与江青、陈永贵的斗争，以张赵集团为代表的造反派，反对“继续革命理论”，致使中央提名为四届人大代表的省委书记王谦落选，以及陈永贵、王谦在华国锋支持下大搞倒清查，整肃清洗与之观点不同者，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历史。

六、《非常年代：1964-1978》（全二卷），香港牛津 2019 出版。赵园著。



作者赵园（1945—），河南尉氏人，1945 年出生于兰州，北京大学文学硕士，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研究。此书是其退休后用了五六年完成的中国第一部文革专题研究著作。上卷分了八章，分别研究“四大”、暴力、出身/身份、文化、罪名/司法、公域与私域、知识分子、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下卷包括五个札记和一个结语。札记是对文革事物的思考笔记，所论关涉文革的分期、文革中的民族地区和乡村及宗教场所，文革中的派别（红卫兵、老兵、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及经济数据等。结语所谈的材料与方法，为研究者必读。



作者在后记中说，写作本书起意较早。最初不过想在学术工作完成之后，写一点关于那个年代的忆旧文字。退休后陆续读相关文献，渐有“研究”的兴趣。学术性写作不免以牺牲“个人性”“可读性”为代价，却有可能较为深入。费时五六年的写作，是与自己不断对话、对已有的认知一再质疑的过程。时有沉痛。但时间起了缓冲作用。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回望中少了一点切身之感。……即使如此，写作中仍时有触动，感动，为一段动人的叙述，为一节坦诚的告白，为勇气，为真诚，为凛冽冰霜中的人情暖意，为面对历史的庄肃，怃然，憬然，悲欣交集，五味杂陈。

作者在序言里说：“关于本书，冒昧地借用一句据说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临终遗言：‘我相信，我已说出了基本事实。’或许将来有一天，人们知道的更是作为寓言、隐喻的文革。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有必要力求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发生在眼前的近事，在在证明了文革并未、从未远去，证明了未经充分反思的历史仍活在现在。”

七、《中国电影：一个制度与观念的历史》（全二卷），美国华忆出版社 2019 年出版。启之著。

启之（1951—）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撰写此书前，作者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毛时代的人民电影》（台湾秀威，2011），影片分析《错乱狂飙毛时代》（台湾秀威，2013），《有梦楼随笔》（北岳出版社，2015）及电影评论集《姜文与〈鬼子来了〉》（编著，台湾秀威，2011），及译著《解释：文学批评的哲学》（文化艺术，1991）等。

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讲的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大陆电影，下卷讲的是文革电影界的境况和创作。关于书名，作者的解释是：中国大陆没有独立自主的艺术史，所有的艺术史，都是政治制度和马列主义毛思想指导下的历史。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第一部论述毛时代的中国电影的艺术史著作。

八、《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世界华语 2019 年出版，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1 年再版。乔晞华、James D Wright 著。

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向中文读者介绍“社会运动学”的理论著作，也是用这一新理论框架分析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代表性作品。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十二章，是对文革中重点省市区群众运动的概况性的描述。下篇八章是对社会运动学的介绍和对毛的党内外思想/组织动员、群众动员的分析和描述。最后一章是对中国未来社会运动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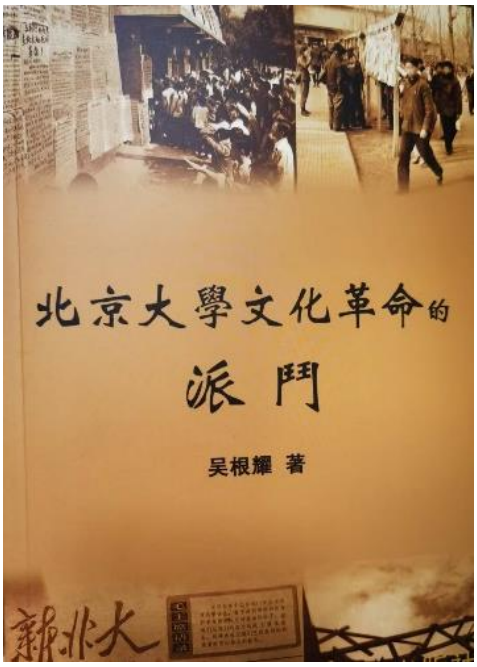
此书是两位作者 2018 年出版的《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义》一书的续集。在绪论中，作者介绍了不同于第二次《历史决议》的另一种文革的定义，“十年文革说”“三年文革说”“毛文革”和“人民文革”的基本观点，论述了“社会冲突论”的理论缺陷。在第十四章中，作者介绍了社会运动学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对社会运动的定义和分类。

此书的第一作者乔晞华博士，是用社会运动学理论研究文革的重镇。在此书之前，作者著有《上山下乡与大返城：以社会运动学视角》（美国华忆 2021）和《文革暴力与造反运动：南外王金事件》（美国华忆 2025）等书。

九、《我的工农兵学员档案》，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4 年，李红云著。

李红云（1951—）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书以作者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英语系 73 级工农兵学员为个案，将这一制度放在文革历史，尤其是“教育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学术上的分析和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该制度形成的过程及其渊源、对该制度的评价、应该汲取的教训等。本书的意义在于，从亲历者的角度阐述当时的真实情况，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并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

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的派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25。吴根耀著。



吴根耀（1946—）1963 年入北大读书。1968 年底毕业离校。近年来从事文革和现代史研究。此书是《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聂元梓校文革兴衰录》的续篇，除补充部分史实的细节外，作者旨在拓展和深化《兴衰录》中的某些评论和观点。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文革时期的派斗”，在简述了派组织形成的基础上，总结了校内派斗的特点，回顾了逍遥派和准逍遥派形成壮大的过程及其社会背景。第二部分“文革研究中的派斗”介绍了“共同编书”“各自为战”和“直面论战”这三个阶段的概况。列数和评析了各阶段，尤其是第三阶段四个回合的主要著作。第三部分“聂元梓研究中的派斗”批驳了两种主要的“保聂”论调。

**** **** ****

笔者视野有限，所列学术著作，或有遗漏。但仅此十部书即可证明，大陆学者文革历史的研究不会因政治封杀而停止。古有“铁函心史”，今有电子网络。约谈、查抄、断粮只能吓倒怯懦者。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不过是自保的借口。记录文革，检讨制度，总经教训，会因文革亲历者的逝去而萎顿、彫零，以至按下暂停键。但只要这类书在，就会薪尽火传。二十年后，当社会转型到来之时，亲历者的孙辈后会为纪念文革发动八十周年而发声。

【思想文化】

政治大词的漂移

——打工者状告资本家

七尺从天

2024 年，在抖音上，童润中这个名字火了，他的粉丝从几千，迅速蹿升到几十万。眼看奔百万去了的时候，他的账号被封了。之所以火，是因为他打赢了几场劳动诉讼官司，老板给了他上万元的赔偿，还给他写了盖了公司大印的道歉信。之所以账号被封，官方没有解释，也难以解释。

一

童润中是九零后，2003 年从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1]，入职某公司，但工作两天后是周六，他没去上班，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周六是法定休息日，你让我上班，是违反劳动法，我在别的公司干过，他们也是这么不要脸”。

老板请他走路。

童润中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他胜诉，公司给了他一万五千元的补偿金。他又起诉公司，要求将补偿金改为赔偿金。法官问他，你就为这么一个字打官司，你以为打官司是儿戏吗？童润中义正词严的回答法官：“我不认为是儿戏，这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我不是为了金钱打官司，而是为了真理。”法官问他什么是真理，他说：“宪法里写的就是真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作为无产阶级劳动者，不能接受资本家犯了错还不认错的态度。这就是我坚持的真理。”

童润中为“补”与“赔”这一字之差，重起诉讼，是依法办事——补偿金是在一方的合法行为导致对方权益受损时的支付，赔偿金则是一方违法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时的支付。赔偿金与过错责任紧密相连，体现了对过错方的惩罚。而补偿金则不考虑涉事双方谁对谁错，它强调的是向受损方提供补偿，不具有惩罚

[1] 童润中，1994 年 8 月 17 日出生，北京人，北方工业大学集成电路专业 19 级硕士毕业生。2023 年 4 月入职扬州某公司，因拒绝周末加班被辞退。耗时一年四个月通过四次劳动仲裁和一次民事诉讼，打赢了五场官司，获得一万五千赔偿金。截至 2024 年 9 月 5 日，在抖音平台有 147 万粉丝。

性质。

童润中对法官的反驳，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掷地有声。

法官无话可说，又判他胜诉。

二、是捍卫真理，还是“高级黑”？

童润中在法庭上使用的这些政治大词——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资本家、宪法、真理——虽然其政治正确性和权威性无可置疑，却让人感到莫名的滑稽。而他越是一本正经，越是理直气壮，人们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以至于有人断定他是“高级黑”——用反讽的手法，给官方话语捅了一个大窟窿，把国家大法隐藏了多年的猫腻抖搂出来。[1]

从毛时代到习时代，这些词都经历过或急或缓，或明或暗的语义漂移，有的由正变负，有的由负而正，有的上热下冷，有的矛盾重重。总的过程是“温水煮青蛙”。而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人们，像被狗追赶的行人，只顾一路小跑地奔小康，无暇也无心回望细想。他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更没有兴趣关心青蛙与水温。而社会生活就在这些漂移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童润中是个例外，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他有着追求正义与真理的热情。不出意外地，他得到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言论必须有边界”的例行警告。被封号禁言的童润中只有两条路，要么在沉默中死寂。要么在沉默中爆发——雄壮庄严的国际歌将唤起他的战斗激情:“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如何趁热打铁，党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不过，在他为真理而斗争之前，我希望这个年轻的硕士先搞清楚什么是剥削？人类能否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他要捍卫的宪法和真理。

三、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在列宁那里，阶级斗争

[1]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有这样的表述:“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防止旧阶级复辟，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阶级斗争是万事之“纲”，是“一抓就灵”的宝典，是社会动员的利器，是搞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帝反修、四清/社教和文革的理论依据。

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从全面化、日常化、群众化退缩到党史里，“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力”“不问姓社姓资”成了指导思想。尽管在“六四反革命动乱”中，阶级斗争一度沉渣泛起，但也很快被“发展是硬道理”“谁不改革谁下台”赶回了毛时代。

到了江胡时代，淡化阶级对立成了当务之急，合法性从“三个代表”身上找到了立足点，执政党成了“最广大人民”的代表，而“最广大人民”包括下岗工人和私企老板这两个曾经“你死我活”的阶级。当初的“阶级代表性”被“执政绩效”挤到一边。“六四动乱”改成了“六四风波”，阶级斗争从日常政治话语中销声遁迹。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毛时代的阶级界限成了云蒸雾绕的山顶景观。只有在“敌对势力”“西方渗透”的语境里，阶级斗争才偶尔露峥嵘。

习时代酷爱“斗争”，但此斗争非彼斗争，其矛头所向是“国家安全”，是“风险防范”，是反腐正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服务于维稳，而不是群众运动。重新启用的“枫桥经验”是化解社区矛盾，改善基层治理。

简言之，后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变成了历史记忆和政治修辞，其基本功能由“党内清洗”和“动员群众”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维护社会稳定”。“阶级斗争虽不讲，自由民主总消沉”[1]道出了维稳的真实用心。

九十年代出生的童润中，能够娴熟老练地用文革的语言逻辑回怼法官，可见退缩到教科书中的阶级斗争教育仍旧发挥着余热。童润中未必知道自己在挑战现存的社会秩序。但他的逻辑清晰而坚挺：既然新宪法规定，要在毛思想的指引下，那么，执法者就必须坚持阶级斗争。

四、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这个词，在毛时代是一个最最“高大上”的概念。它意味着，凡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人，在旧社会里都是受剥削压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

[1] 丁东策划采录，李南央整理编辑《李锐口述往事》页 414，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

人。这些人是破产的农民，当他们跑到工厂里做工，就成了有组织有纪律具有满满的革命性的工人阶级，成了无产阶级最纯正最高尚最可靠的先锋队。因此，工人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的替代性表达。

在马列毛的思想体系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这一对概念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先验价值观——平等正义、大公无私、革命英雄主义、为集体牺牲个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在这套理念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了普世而先进的代名词。

按照苏联的说法，共产党政权下不再有无产阶级，只有工人阶级。[1]但是，毛仍旧特别喜欢无产阶级，他把这个概念当作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成了“正确的”“革命的”的代名词，于是毛以其为定语，不断地创造新名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司令部”……。毛还发挥了诗人的特异功能，把这个概念当成一种象征性修辞——“兴无灭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当年全世界都知道，现在唯恐全世界知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邓小平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采取了逐渐淡化的办法，一方面，在官方文件中让无产阶级一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改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挤到了一边。还打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不姓穷”的旗帜，将这个“以穷为荣，为革命”的阶级抛到了历史角落里。工人阶级不再被强调为政治主体，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名誉、地位在后邓时代遭到了进一步的重创。“三个代表”把这个“领导阶级”排挤到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之外，这个革命的“唯一代表”从此和光同尘，屈尊于“最广大人民”之中。党的自我定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中华民族先锋队”。

具体的打击来自两方面，一方面 90 年代末，国企改制，三千万工人下岗。[3]

[1] 按 1953 年版的《人民词典》，第一，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基本阶级，第二，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雇佣工人阶级，其特征是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不占有任何生产工具。第三，按斯大林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的阶级，第四，无产阶级不同于工人阶级，后者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已经成了领导阶级。在全世界的范围，无产阶级仍是适用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很简单：“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

[2] 据《现代汉语频率辞典》的统计，在 1978 至 1980 年的语料中，“无产阶级”这个词，即使在八千个常用词里，也是排名靠前的。

[3] “三千万工人下岗”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主要原

另一方面，毛时代被定位剥削者的私营企业主被允许入党。而这种社会被称为“和谐社会”“人民至上”。尽管宪法和党章里仍然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字样，但是“人民”“群众”“劳动者”这些非阶级性的称谓成为主流。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则在学术上判了工人阶级死缓——在当代中国的十大阶层中，工人阶级位列第八。值得庆幸的是，“九天之上”的工人阶级，还没掉到“九地之下”——在他下面，还有农民和无业失业者垫底。[1]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反动文人胡适”的主张：“真正的阶级划分是食税阶级和交税阶级。而所谓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同一个阶级。”

童润中不知道，在他出生之前，煊赫一世的领导阶级，就已经沦为弱势群体。而他引以为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则从政治主体退化为帮扶对象。他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仅仅是制度表层的涂料。恰如李锐所说：“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共产党不过是借这个招牌办事而已。”[2]在童润中赢得这场官司之前，他与他所依恃的阶级，就被新时代送到了历史的回音壁，成了一处“游人止步”的人文景观。

五、资本家

童润中说，他“不能接受资本家犯了错还不认错的态度”，这等于说，他生活在一个资本家有头有脸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但存在着剥削行为，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剥削阶级。

童润中的这种观点是主流话语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在网络上坚持宣传这个观点，当局可能以“煽颠”罪将他绳之以法。他的抖音被封就是一个信号。其实，从客观上看，童润中的上述言论属于正能量。他提醒当局，第一，必须强化青年

因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的问题。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成为重点。政府推行“抓大放小”政策，即保留大型国企，中小型国企则通过破产、兼并、出售等方式改制。改制过程中，大量工人被“买断工龄”后下岗。据统计，1995 年至 2003 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从 11.8 万个锐减至 3.42 万个，国企职工人数从 1.126 亿降至 6880 万，减少约 4400 万人，其中约 3000 万为下岗工人。“三千万工人下岗”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它既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积弊的集中爆发，也揭示了市场经济改革中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改革不能仅以经济数据为衡量标准，更应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与尊严。（节选自 Kimi AI）

[1] 由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2] 丁东策划采录，李南央整理编辑《李锐口述往事》，页 180，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

的思想教育，改变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第二，追究北方工业大学的责任，开除该校的政治思想课教师。话说回来，那些政治思想课教师，要“讲好中国资本家的故事”也不容易。

资本家，在毛时代是个最负面的词，1949 年前后，有办法的资本家都跑了。没跑的，先是在“五反”中自杀，[1]随后，敲锣打鼓地把工厂企业商店拱手交给了国家，成为被赎买的“原工商业者”。但是，在中共的心目中，他们仍是时刻准备复辟的阶级敌人。不用说资本家本人，就是资本家的儿女亲属，也被打入另册。文革当中，资本家、小业主被活活打死是寻常事。“196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底……，北京全市被打死 1772 人。”“曹荻秋在同年的 9 月 4 日讲话：‘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千家。’”9 月 18 日曹在汇报上海的文革战果时，“说上海搜出黄金 48 万两，是北京的 10 倍。”[2]资本家的儿女，即使如张文铮三年不认父母者，仍背负着出身的黑锅。[3]最惨的是郑梅萍——上海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郑念的女儿，竟被造反派从高楼扔下摔死。[4]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出身们则不得不忍辱含垢，委曲求全。

举一个不那么悲催的例子，么先生 1954 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因为对出身好成绩差的农村学生表现出不明智的优越感。肃反时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他白天挖空心思地交代所有的‘不良思想’、‘家庭根源’和‘社会交往’，晚上就在被子里面抽泣流泪。最后得到了认罪态度较好，记录在案、不戴帽的宽大处分。”反右时，他虽然一言未发，仍被划为“漏网右派”。先后谈了两个女友，都因为他的出身未果。1959 年分到重庆一个工厂下属的中专当老师，厂方对他一直“控制使用”。1963 年调到邯郸，负责一个大项目——仿制苏制的指挥仪。经过六年忘我的投入，项目进入调试阶段，他被“靠边站”，一个出身好的人取代了他，调试成功，仪器投产。荣誉离他这个“总工”远去。[5]

[1] “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到具体的数字，仅据上海从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 876 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十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页 498。原注：参见《五反运动情况》59，1952 年 4 月 10 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3/144。

[2]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1）页 106，113。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

[3] 张文铮是电影《不夜城》中的主角，资本家张伯韩的独生女，为了与父母划清界限，摆脱资本家出身的恶名，她离家出走，参加了地质勘探队，三年不与父母联系。

[4] 见郑念著《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5] 么书仪《寻常百姓家》页 74-85，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

1979 年，给资本家摘帽。[1]邓小平发话，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资本家从被改造的对象和潜在的敌人，变成了经济建设的依靠力量。如果说荣毅仁的就任光大集团老总，预示着资本家枯木逢春的话，那么，允许资本家入党，进政协、当人大代表，则标志着资本家的翻身得解放。

直到这个时候，资本家的真面目才露出水面——吃“剥削”饭并不容易。你要选项目、搞供销、拉关系、懂技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里完全派不上用场。想当老板的多了，有几人成功？周有光先生在 104 岁时说过这样一番话：“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生产力等于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管理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学科。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的发明家。”[2]

资本家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属于同一词语链条。毛时代他们都是关在阶级斗争监牢里的死囚。“霹雳一声开新宇，改革开放创生机。”邓小平打开牢门，请这些难兄难弟到经济建设的广阔天地传授致富经验。狱友们劫后重生，纷纷移步换形，各显神通。

换了马甲的资本家登堂入室，资本主义轻装前进，在腰斩了“主义”之后，大摇大摆地穿梭于政商两界，在学术讲台上高谈阔论：资本积累、资本运作、资本市场、资本扩张、资本逻辑……。小资更是苦尽甘来，不用换装，不用肢解，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跃升为高学历高品位的城市白领一族。

大约从荣毅仁出山的 1983 年起，资本家这个词在大陆媒体上就迅速暗淡下去，时代换了马甲，官僚资本叫国企，买办资本叫合资，民族资本叫民企。资本家成了有钱有名有地位的“成功人士”。

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在民间收获了普遍的“羡慕嫉妒恨”——当初先富起来的，靠的是聪明才智和克勤克俭，如今先富起来的，靠的是勾结官家和买通关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册，页 452，人民出版社，1997 年。“据统计，1956 年参加全行业合营和以前单个儿合营的工商业者共计为 86 万人。1979 年 11 月 12 日，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把员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根据报告规定，共有 70 万人被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恢复劳动人民的身份。还健在的原来的资本家，也被真正当成国家财富，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

[2] 周有光：《朝闻道集》，第 29 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

系。[1]当初的资本家用三代才能完成的原始积累，如今的官二代（如用军舰走私汽车的薄熙成们）只用了短短几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2]人们一边渴望像他们一样一夜暴富；一边痛斥他们是剥削者、吸血鬼。在这个队伍里，童润中是一个出色的战士和杰出的演员。

六、资产阶级

中国在 1956 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1957 年，毛有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发现——这个被消灭的阶级魂还在，思不死。于是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这个假想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到临终，他还念念不忘“七八年再来一次”。

八十年代初，中共为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3]分成了两派。在改革派的字典中，资产阶级虽然被定义为一种有害的思潮，但不再是必欲除之的敌人。而在保守派（左派）的心目中，资产阶级仍旧是最主要的敌人。1983 年，“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4]的凛然警告传达到了中央党校。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索，也被胡乔木、邓立群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中最肮脏的东西”而大张挞伐。

在普遍的抵制下，这场被称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展了不到三个月就偃旗息鼓。随之而来的“三个代表”更是给了保守派当头一棒。当“民营企业主”“私营经济人士”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候，保守派的破产也已成定局。“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在大众传媒和日常语言里，完全被 “成功人士”和“中产”取而代之。跻身“资产阶级”成了千百万家庭的奋斗目标，而对于那些月入千元的六亿打工族来说，这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尽管“乌有之乡”不断地抱怨改革开放催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但是无法阻挡社会学的“去资化”和“去阶级化”——毛时代的四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

[1] 详见向南雷：《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新时代的社会分层——蔡连生<我经历过的两个企业破产>解读》（《记忆》第 291 期）。

[2] 详见蔡连生：《风雨之路——我经历过的两个企业破产》（《记忆》第 290 期）。

[3]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 年 8 月 18 日）一文中说：“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又说“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邓小平文选》（二），页 296、298。

[4] 这是 1983 年在中央党校传达的胡乔木一个讲话中的两句。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页 299，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民族资产阶级）被分成了十大阶层、五大等级。[1]童润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从经济状况来讲，只存在于五大等级的中上级。而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则生活在这个等级序列的最底层。

在十大阶层中，童润中属于第四层（占有文化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那家扬州的公司老板属于第三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五大等级中，他至少属于中中层。如果童润中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话，那么，十大阶层、五大等级中人，人人有份。

七、社会主义

童润中在法庭上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社会主义”。1981 年中共制订第二次《历史决议》的前后，就对如何定义这个概念有过激烈的争论。从 1980 年代到 1992 年，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至少提过七次，其结论一言以蔽之“我们没搞清楚”。

胡乔木补充：“我们曾有一个口号叫‘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两句话是很好的话，内容很好，语言也很好，是‘格言诗’……但是，这两句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堵住资本主义的路？什么叫资本主义？应该把它弄清楚。”胡似乎弄清楚了：几十年来，一直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了资本主义来批，“副业经营是社会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小量自留地、家庭副业是国家宪法上规定的，党的正式文件所肯定的，也叫资本主义？”[2]

黎澍似乎比胡乔木弄得更清楚：“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一大缺陷，那就是只重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忽视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3]“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最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4]黎澍的思想，改用胡乔木提到的那个口号，就是“堵住了社会主义的路，迈开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步。”

[1] 中国当代的社会学者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分成了五种社会等级（社会上层、 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版），页 29-30，人民出版社，2015。

[3] 《黎澍十年祭》页 218，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4] 黎澍《再思集》页 56，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

这些党内理论家，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战胜封建主义的，不是他们努力弄清楚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的资本主义。

正因为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而造成了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光荣复辟。结果是“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饿死三千万，也没解决温饱问题，还制造出千万个冤假错案。面对着“三信”危机，道德沦落，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危境，邓小平悟出了一个道理：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姓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跟着美国的都富了”“发展生产力”，废除“兴无灭资”，“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 直至 1982 年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尽管这些被称为“邓小平理论”的只言片语，既没有理论框架，也没有深入的论证。但它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毛式社会主义，改变了无数国人的命运。

童润中能站在法庭上维权，全拜“中国特色”所赐。他口口声声地社会主义，经过四十年的语义漂移，离他心中“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已经远得不能再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术语，被置换成了“小康社会”。尽管入党誓词中，还保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句套话，但是在日常语言中，“共产主义”早就成了“黄粱梦”的代称。大跃进时的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成了对毛时代的反讽。“社会主义铁拳”成了控诉“喝茶”“约谈”的“黑话烂梗”。2023 年 8 月，几个留英的华人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刷在了东伦敦红砖巷专供涂鸦的百米墙上，遭到了海外华人热烈的“配合”——“富强”二字下面写上了“六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汉字。“民主”二字下面画上了坦克车和持枪的士兵，“自由”二字旁边画着一张贴了封条的嘴……

童润中在法庭上，骄傲地为社会主义背书， “中国特色”愈发沉醉在自己营造的吊诡之中：一边大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边又否认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大成的普世价值。一边自封为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嫡孙，一边又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与之并列共举。一边大力宣扬“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一边继续违反国家大法，令国人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

这种理论与知行上的矛盾惶遽，早在 40 年前就奠定了基础——既要彻底否定文革，又要坚持毛思想。既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又要废止“兴无灭资”。[1] 既要反对资本主义，又要遵从资本逻辑。这种“既要……又要”造成的巨大张力，为后世的思想错乱开辟了道路。童润中得其所哉。

八、宪法与真理

在童润中话语中，宪法与真理是两个关键词。什么是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它规定国家政体、根本制度、权力结构、基本权利与公民义务等。它反映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价值，会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说到底，宪法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个临时性的政治契约。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人对它的认识可以由浅入深，但客观规律是超越的、普遍的、客观的、不可移易的。

用真理来打扮自己，赋予宪法神圣性和合法性，是统治者最擅长也最热衷的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童润中把毛时代的理论搬到法庭上，以及宪法的不断重写和修改[2]的实践本身，就说明它不那么“真理”。

如果你对“宪法与真理”的关系不甚了了，可以从话语理论中得到启示——

福柯认为，权力制造了话语，话语制造了制度、理论和规矩。权力不但决定它们的对错，还决定其表述方式。比如，现实中不占有资源的工人阶级在宪法中仍被称为“领导阶级”，毛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宪法中同时被确认。这一类脱离实际和“内涵冲突”形成的巨大张力，都被宪法话语强力压平捋顺——“工人阶级”的说法不变，是为了政治合法性，毛思想与邓理论的并肩而立，是为了“历史传承”。而“宪法虚置”[3]的问题，在毛时代是出于阶级斗争，在后毛时代则是为了“安定团结”。通过这番政治话术，宪法舍得万世骂，竟将逻辑拉下马。

---

[1]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 280-298。

[2] 新中国制定了 4 部宪法（1954、1975、1978、1982），现行的 1982 年宪法经过了五次修正（1988、1993、1999、2004、2018）。

[3] 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自 1954 年的第一部宪法到 2018 年的第四部宪法，这些条目不但被“虚置”（constitutional nominalism），而且被践踏。不必说反右时的查抄、批斗和诬陷，不必说四清时的关押捆绑罚没，不必说文革中二千万人受迫害，上亿人被株连。仅看看后毛时代的文网和“三年清零”，就足以说明宪法已经成了一个蜃景，一个黑色幽默。

在语义学的词语链条中，“中国宪法”的政治链是党的领导、工人阶级、极权国家、专制统治；经济链是共同富裕、权贵资本、两极分化；管理链是以人为本、军队、警察、媒体、教育等。这些话语形塑了“中国宪法”的认知框架：宪法是国家的政治宣言，它需要的是叙事一致，而不需要逻辑自洽，更不要指望它能对社会做出真实的描述。

九、结语：童润中的前途

赢了官司是好事，封了账号是坏事。最坏的还在后面——官家怕他把宪法当真，商家恐惧他的阶级理论。尽管打工者为他叫好，维权者为他点赞，异见者为他的“高级黑”欢喜。但是，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他——当所有的企业都对这位“无产阶级劳动者”敬而远之的时候，他就会从第四阶层跌落，为五大等级垫底。

回家啃老不符合他的性格，唯一的出路就是创业——开公司——剥削员工，当上“不要脸”的资本家。为了防备他的公司里出一个童润中式的员工，他要上勾下连，与党政领导和司法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

【历史研究】

四川文革史 · 导言

周孜仁

沉重的历史宿命

巴蜀旧郡四川[1]，以其丰饶、雄奇，险塞，还有悠长神秘的历史，历来为诗人墨客所咏诵，为政治家所倚恃、为阴谋家所觊觎、亦为兵家所必争也。因此，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乌托邦冒险从天而降，给四川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就尤其令人瞩目。耿耿十年，为控制川省乱局，最高当局发布了诸多文件、讲话。其中被俗称为“三一五指示”[2]是为最者，周恩来讲话开篇即引一古

[1]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成为直辖市。文革期间尚为四川省辖区。故本书所记四川，含蜀地（成都及相关地、市、县）和巴地（重庆及相关地、市、县）

[2] 指 1968 年 3 月 15 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时的讲话》（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1968 年 3 月 19 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工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政治部翻印）以后引用均同。

语警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足见北京政治中枢对整饬川局的心绪难宁。

上述议评川局治乱的断语见于蜀人欧阳直《蜀警录》，其义本为痛陈明末农民造反头领张献忠屠川惨祸，继后被治川者奉为警笈者。事实上，作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及湘西山地四围环峙的盆地故郡，蜀道难通而民丰物阜，乡俗勤勉而秉性厚韧，称其首倡乱局而曰“先乱”，实无史据可证。作为全国危难时局的避难所和战略后方，历史则不鲜其例，最近的史案首推抗战，川人忍辱负重，奉献牺牲，终得守住故国破碎山河，直撑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中共《新华日报》曾专发社论慨赞：《感谢四川人民》[1]；紧接中共军阵击鼓入川，接盘满目疮痍的巴蜀旧地。史载，1949 年国军溃逃，已收走全年粮税，新朝初定，不得不再次下狠手收粮 ，面对武装征粮队，四川父老不得不再次勒紧裤带，交出可怜的填腹粮米[2] ，确保了新政权稳步定鼎并快步运行。谓“天下已治蜀后治”，庶几宜之。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巡幸巴蜀，漫游古祠，泛舟三峡[3]，四川俨然一派欣欣向荣。“麦苗青，菜花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4]，颂词欢歌一时响遏行云。可惜，正是中共历史上这一次著名的成都会议首倡“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中国很快卷入热昏旋风之中。农业大跃进的主旋律“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横扫巴蜀，于是“层层压，一个压一个，压到老实人也说假话”，川人被再次打入深渊。大小酷吏对基层干部（为数不少的基层干部本身也属微型酷吏）和种粮百姓均遭捆绑、吊打、抄家、砸柜倒罐……棍棒之下，何粮不得？无非多死点人罢了。1959 至 1961 三年时间，四川饿死人口 1000 多万！[5]

[1] 见 1945 年 10 月 8 日《新华日报》。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2] 东夫：《四川记忆：1950-1962》第一章第二节“空前的重税”载：“1950 年间补征 1949 年公粮和征收 1950 年公粮，共计竟然达到 11394 万斤。”为“1948 年国民政府征收量的 4.5 倍以上。”

[3]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在李井泉陪同下，游览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多处巴蜀胜迹。

[4] 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以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为题创作。张士燮填词，金砂谱曲。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时唱遍大江南北。之所以称农庄，是当时因袭老大哥苏联“集体农庄”之称谓。

[5] 杨继绳《墓碑》第三章“天府饥魂”载，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死人数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

被官方竭力宣传为“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在 1962 年 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被刘少奇转述农民的说法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各地与会干部纷纷吐苦水，发怨言，或直接或委婉地表达了对“三面红旗”的不满。事后，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一门心思要挽回下降威望，唯恐“大权旁落”的毛泽东，执意以一场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他身后可能发生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扼杀于萌芽之中。

四川再遭劫数。邪恶被无端的仇恨触发，互害就不再是文化可以界定的；詈骂不足以发泄愤怒，血肉相搏从而枪炮相向就成必然的续章。巴蜀人曾在钓鱼城下表现过的勇武[1]，尤其是在中共宣传的“英烈”故事彰显的献身亡命，使四川的市街野原，成为无数冤魂的屠场，浩浩川江成为喋血浮尸的坟墓。

1967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湖北省新任领导人曾思玉、刘丰及陪同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2]

1968 年 3 月 15 日，江青与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讲话称：“特别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3]

1968 年周恩来批评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负责人叶正光[4] 时亦有此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5]

川人血肉模糊的万千血肉尸骨，在大人物嘴里已然轻松的调侃谈资，再次不幸地证实了四川“后治”的历史宿命。标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伟大胜利”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按成立时间排序，四川位列第 25。

“西南王”的运程盛衰

文革之所以能在四川迅速发动从而酿成大惨祸，与执掌西南、首先是四川

[1] 元蒙时代，大汗蒙哥率兵攻打重庆合川，被阻击于钓鱼城凡 40 年不克。蒙哥殁于该地。
[2]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 1967》，页 220。
[3] 引自“三一五指示”
[4] 新四军军长叶挺之子。
[5] 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页 144。

省 7000 万百姓生杀大权的首席长官李井泉直接相关。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1909 生。1927 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1930 年夏，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联络，旋得前委书记毛泽东青睐，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随即被分配到毛泽东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办公室做秘书。

红军时期，李井泉被安排去前线培养，从普通秘书提拔为师政委；抗战爆发，担任 120 师 358 旅政委。1938 年 6 月，中共开辟大青山根据地，要求派往该地区的领导“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的“精干者”。毛亲自点将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 年，李凯旋，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于 1945 年 8 月再被委派山西任晋绥野战军政委，与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平起平坐了。得毛泽东一路提拔，1946 年春，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兼晋绥军区政委，其党内职务已高于贺龙。建国后，李井泉进阶再提速，短短十年，由川西区委书记晋升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继而西南局第一书记、继而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 1935 年甘孜会师李井泉就与贺龙共事，二人关系密切。毛、贺蜜月期，李井泉自然左右逢源；一旦毛、贺交恶，李自然便成了牺牲品。七千人大会后，李井泉始与毛心德疏离，同期，贺龙在毛、刘（少奇）俩主席之间站队有错，亦失毛宠。深谙毛道的林彪趁势落井下石，他在一次讲话里说：“李井泉是大黑帮。经过几十年的观察，这个人最阴险，一句真心话都没有说过。”[2]文革肇起，李井泉与刘澜涛[3]成为第一批倒下的中央局书记，便成题中之义了。中央对李井泉的指责虽未提及令川民最为愤恨的大饥荒问题，但李大搞浮夸风、共产风，仍然是被群众斗得最厉害、也是他检查交代得最多的“罪行”。文革期间，其妻肖里在关押地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其子李明清就读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乱拳打死[4]，川人均额手称快，足见其民怨之大。

李井泉形容刻板，不苟言笑，还在晋绥分局任书记时便以霸道和“左”倾著

[1] 贺龙为常委

[2] 林彪在 1966 年 11 月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西南局机关造反指挥部揭发材料，载《新西南》第 3、4 期合刊，1967 年 9 月 13 日）

[3] 刘澜涛，文革开始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

[4] 肖里(1917-1969),时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肖出生于河南商水县士绅殷实之家，祖父为武进士，曾获“御前侍卫”功名。李、肖婚后共生有六男二女。次子李明清文革时就读于北航 6 系（导弹系），与另外四位高干子弟公开写大字报“炮轰”中央文革，被造反派学生批判群殴后死亡。

称[1]，主政四川后，其作风霸道和政策极左的恶名更让四川官员闻之瑟缩，用当时四川官场流行的话说，李井泉在党内生活里常执“家长作风”。阿坝藏族自治州革委会主任、藏族干部杨岭多吉说得最直白：

李井泉的会议我参加过，大家都像耗子见到猫一样[2]。

某次，四川省委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召开三级干部会，李井泉主持。李讲话历来声微气弱，坐在礼堂后边的人难以听清。一位县委书记站起来大声提议：“后边听不见，请把扩音器声音加大点”。李厉颜追问：“谁在后边吵吵嚷嚷？”工作人员报告后边有人听不清楚，李不耐烦地将手一摆，命令：“叫他出去，立即出去!”。那位县委书记立即被“请”出场外，会场果然“鸦雀无声”了。[3]在李井泉眼里，他治下的四川干部不过是他李姓家奴罢了。四川无论百姓、干部（包括基层和高层），说到“李政委”，无不切齿于心。甚至中共老资格官员、四川省长李大章亦私下称其为“飞扬跋扈的独裁者”。[4]

川人对李多有怨愤，首先因为持续 3 年的大饥饿，家家有本苦泪帐。1961 年，四川农村已然饿殍盈野，某夜，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级招待所玩牌消暑，省委办公厅主任黄流急匆匆来报称李大章省长来电：“周总理听说四川粮食困难打电话到成都找政委商量，国务院准备从黑龙江调粮食给四川救急。”省长接电话后立即从成都紧急来电求告，请李政委接电指示。不想李井泉玩兴正浓，不耐烦地挥挥手道：“你去接就是啦!”少顷，黄流返回又报，再扫牌兴，李井泉愤愤甩牌怒道：“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为什么去压国务院呢？我们也是个小国务院嘛！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奉命陪玩儿的重庆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对乡下骇人听闻的饥灾深怀焦虑，直等到李赢了几圈，开心了，这才小心翼翼试探：“政委，农村确实需要粮食啊！周总理给粮食能救活多少人哪!”

不料李井泉再次摆手作怒，道：“打牌，打牌，休谈政治。”[5]

[1] 重庆市委书记孙先余为晋绥老同志。在重庆市委常委会上公开说过：四川的“左”与晋绥的“左”是同一格调，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一贯的“左”，他还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至今劣根未除。他的阶级 分析是主观臆断，不切实际。见廖伯康关于 1962 年重庆市委 18 次全会的回忆。廖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重庆市团委书记。

[2] 《赵紫阳在四川》页 75

[3] 于克书回忆文稿：《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真情始末——我在四川“萧李廖反党事件”中的经历》。于克书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

[4] 东夫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页 345.

[5] 于克书：《上书毛主席反映四川真情始末——我在四川“萧李廖反党事件”中的经历》。李井泉来重庆休闲，市委常派于克书、和罗广斌等青年干部陪同打牌。1962 年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李井泉在四川强迫命令

农村大面积饥饿死人，城里人亦未能幸免。1960 年 8 月。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当局竟突然袭击，宣布从 9 月 1 日起启用新的四川省地方粮票，除全国粮票外，庶民百姓省吃俭用积攒度荒的地方粮票一律作废：4800 万公斤口粮顿时灰飞烟灭！[1] 此举无异于在经济危机时宣布钞票作废。官方对百姓如此公开大规模抢掠，全国仅此一例。川人只能徒叹奈何！

再说干部。1959 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大反右倾，痛批“彭大将军”。参会代表李井泉对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已大获“胜利”一清二楚，回川贯彻会议精神却对此闭口不言，反倒有意将彭德怀挨批的《意见书》先发给大家看，上午看下午讨论。其时巴蜀农村形势正日趋严酷，彭的《意见书》引起不少川官共鸣，纷纷表态赞同，孰知会议次日，李即宣布中央对彭结论，干部们方知重演了一回 1957 年“引蛇出洞”的旧剧，心里大呼上当——只是这一回，他们自己成了被引出来的“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恶和报应是对等的。作恶太多，报应必然最狠。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四川文革之蜂起与暴烈，对李井泉及其党羽批斗之凶狠与无情，正是李本人作恶的直接效应。虽然林彪事件后的中共“十大”，李井泉被再次忝列“中央委员”，继而复官，他回川游走，见人就赔礼认错，声称“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以期旧地再起。可惜无人应承，曾经炙手可热的“土皇帝”最后只得寂居京师，以中顾委常委之职于 1989 年离世，终年 79 岁。

中国多有典籍记载民众对酷吏及其苛政之仇憎。《新五代史·赵在礼传》有载：“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做官做成百姓的“眼中钉”，实为中国吏事之一大悲哀。李井泉因圣宠而崛起又因圣弃而败落，其败落竟会有如此广泛而强烈的民意基础，实当为官者戒。

四川地下党的苦难历程

自辛亥革命以降，四川一直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发轫之地，为中共高层贡献

瞎指挥导致大饥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遭到李井泉打击报复，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重要成员，批判后撤职下放。

[1] 1960 年 9 月 1 日，“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四川省粮食厅发布关于发行新的四川省地方粮票、油票和废除旧的地方粮票、油票的通知，宣布 4800 万公斤旧粮票（实际是四川省干部群众从很低的粮食定量中节约下来的）作废。”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49—1978）》2000 年 4 月第一版，页 207。

了许多重量级人物：吴玉章、张澜、邓小平、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杨尚昆……特殊的历史氛围和革命先贤的感召，四川许多知识青年（包括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1]等智囊精英），亦均由此地出发，义无反顾地参加尚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走上奋斗牺牲之路。从十年内战参与川陕根据地工作始[2]，到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央南方局开展了整整 6 年斗争，再到解放战争前夕吴玉章、王维舟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 ，领导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斗争。四川的地下党员们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这些，都为中共成功夺取全国（包括四川）政权，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但是，“地下党”的命运在建国后不幸遭遇了“过山车”般的翻转——尤其在专横跋扈、嫉贤妒能的李井泉治下，两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第一，留在四川的“老资格”，和身处京城、已成中共高官的老乡很容易声息相通——所谓“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冒死向北京反应“省委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3]致使四川饿死 1000 万人的惨祸，就是首先惊动了位居北京中枢的杨尚昆、继而邓小平等多位四川老乡。地方官员与京官交往过密，历来被各朝各代视为宦场大忌。李井泉要坐稳四川老大的位置，必得消除这个隐患。

第二，中共接管川政前夕，四川地下党发展过快，确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之嫌。西南局定鼎，曾对此进行过清理，按毛泽东所制“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令，剔除了许多不合格者，甚至投机分子，但作为中共老区，在四川担任领导职务、土生土长的川籍干部实在太多——这些人注定让李井泉不放心，也注定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削减，如：“反右”中打掉的重庆市委所谓“张（文澄）[4]陈（孟汀）反党集团”、1963 年利用阶级斗争

[1] 田家英(1922 年-1966 年)，本名曾正昌，四川双流人。1936 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共。1948 年至 1966 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 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

[2] 曾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 年，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遭张国焘非法关押，直到长征胜利才获平反。抗战，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捕后和在成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一起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戴笠停车场。

[3] 这是廖伯康向杨尚昆汇报四川饿死人时使用的隐语，“省委主要领导人”即指李井泉。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页 159

[4] 张文澄（1915-1998）四川仁寿人，1937年参加中共，随即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川、滇、沪、港、鄂等多地开张地下工作。1950年代初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1957年春，重庆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对张文澄心存嫌隙的李井泉趁机将其打成“右派”。

再升级，重庆再打掉“萧李廖反党集团”。文革伊始，李井泉首先整肃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黑帮”，亦清一色由老地下党组成。

孰料这一回出师未捷，李井泉自己先被打翻在地。而被李井泉整得死去活来的地下党们更没料到，压在头上的李氏大山刚刚崩塌，另一场毁灭性灾难又凌空骤降。“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一经成立，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理“五一六”“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更为严苛的打击接踵而至。四川地下党再次成为被整肃的异类。中央领导在“三一五指示”中发出狠话：“‘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川掀起的“批清”运动对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对四川地下党员的清理迫害更加残酷，株连十万之众：被批斗、打伤、致残，有的甚至被判刑、死于非命。[1]

潮起潮落

与其他省市不同，四川文革一大特点，是第一波群体性社会骚乱肇始于重庆而非省会成都，构建成四川文革的“双城记”。有学者试图从重庆政治历史影响、自然地理环境、甚至市民地域性格对此作出解析。比如：重庆曾为抗战“陪都”及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大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比如：共产党建国之初的西南局曾设置于此，撤局后大批军政干部始调入省会成都；又比如：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恶劣的生活环境和通达的地理位置铸就渝人耿直火爆的地域性格和码头袍哥的侠义传统……

这些都是原因。但细究史料，引爆重庆文革最要命的因素，准确地说，应该是文革初肇的 1966 年 7 月，北京为了倒李（井泉），采取非正常手段，对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发起了突然袭击[2]，极端敏感的重庆

并在重庆宣传文教口来个“瓜蔓抄”，打出一个“张陈反党集团”。陈孟汀时任重庆市文教部长。

[1] 李亚宁：《从迫害四川地下党到镇压四川“三老会”——我所亲历的四川文革第一大案始末》

[2] 任白戈（1906—1986），30 年代初曾任“左联”秘书长，文革爆发时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长。1966 年 7 月 6 日《人民日报》转发《红旗》7 期穆欣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在注释中点了任白戈的名。随即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8 月 27 日，李井泉在重庆市委召开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宣布将任白戈罢官。1967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称“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和第一政委职务。”1968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将任白戈与其他几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一起并称“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

大学青年学子于是群情大愤，其时，作风廉洁、深得学生敬佩的校长郑思群正被市委工作组逼供，不堪凌辱，断然自戕……这些构成导火线，终得首演了轰动四川的“八一五事件”。八届十一中全会闭会，李井泉从北京仓皇来渝弹压，动作强劲却蹩脚，反而让群体骚乱向全川泛滥奔涌。1966 年 11 月 13 日，李井泉在成都群众的首次批判会上趁乱潜逃，两月后被造反学生从上海“智擒”捉回。全川群众造反狂飙突进，当局幕后操弄的“保皇派”全线瓦解。紧接，各地“夺权”运动訇然而起，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的“保皇派”全线瓦解。

毛泽东为防局乱，旋即令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可惜，成都军区偏偏为保守派站台，对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此为著名的四川“二月镇反”。全川一抓就 10 万人！巴蜀政局顷刻间全境噤声——此为四川文革之初始时段也。

需要补充的是，李井泉治下蒙受打击的干部，借力第一时段的群众骚乱，或明或暗，陆续起而抗争，且有一对幸运者意外逆袭成功：文革前因自多劣迹、被四川省委撤职、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二人被北京高层断然圈定为最佳“打李（井泉）利器”，二人落马前任职的宜宾地区被圈定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由是，以平反“二月镇反”破题，自 1967 年 4 月 1 日始，北京当局紧锣密鼓召集多次专题会议解决四川问题；5 月 7 日，正式颁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定性李井泉、廖志高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任命张国华为四川省革筹小组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张西挺为组员。有鉴于驻军重庆的“副统帅”嫡系五十四军，其支持的“八一五派”确系造反派，“红十条”下达后，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俗称“红五条”）。

当是时也，巴蜀社会格局已成。以“二月镇反”为界，所有群众组织重新洗牌站队并形成全川性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成都的学生“八二六”派、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与重庆的“反到底”结盟，自命《红十条》派；重庆的“八一五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结盟，以“拥军”自诩。而已然获北京标称为“正确路线代表”、并手握川局行政实权的刘、张，为巩固扩展自身政治权益，理当亲前者而疏后者，两派纷争由是愈演愈烈。一派发誓：“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杀头我杀头”，一派则发誓：“刘张坐牢我把门，

流”。1977 年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刘张杀头我提刀”。批判的武器很快被代之以武器的批判，著名的重庆大武斗、川东万县、涪陵等地的大屠杀、川南 “武装支泸（州）”等“准战争”相继登场。

可惜，和北京高层的政治“标的”相较，这些触目惊心的血腥惨祸以及巴蜀庶民的深重苦难，全然轻若鸿毛，不屑一提，北京高层既然高调认可刘、张并赋予超重权能，岂能自我打脸？1968 年 3 月 15 日，北京召开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中央要员集体出面，强断是非，宣布“反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1]没有任何人再敢说三道四，势不两立的两派头领于是规规矩矩“大联合”。两个月后，5 月 31 日，“新生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一片锣鼓喧嚣中宣告成立。

事情并没有结束。等到象征文革伟大胜利的“九大”开过，1969 年 11 月，北京再次召集会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12 月 25 日，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上报的《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经毛泽东允肯“照办”后以中发（69）87 号文件发出（史称“一二二五”批示）。社会结怨太深、官场树敌太多，刘、张被重新被定义为“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踢下舞台[2]。四川需要恢复秩序了。

自《红十条》下达即被北京确立的川省一把手张国华，行事周全稳重被坊间戏称为“八级泥水匠”（和事佬），如今则被北京指为对刘、张错误“制止不力”，遂在“一二·二五”批示中免去“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之职，林彪旧部、四野虎将梁兴初顶替为“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梁与成都军区副政委、同属四野旧部的谢家祥，成为四川文革政局的实际掌门人。梁、谢以清除“刘、张社会基础”为名发起“一批双清”运动，再造冤、假、错案，戕害庶民群众，全川收审人数和“二月镇反”等同，再达十万，整肃之烈度可知也。孰料“九一三林彪事件”突发，“一批双清”无疾而终，文革剧情再次大反转。

轮到清算“梁、陈、谢”[3]了。现在需要为“一批双清”的受难者平反昭雪

[1] 见《三一五指示》。

[2] 1978 年 6 月 20 日，刘张被捕入狱；1982 年 3 月，四川省高级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张西挺判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3] 梁、陈、谢分别指梁兴初、陈仁麒和谢家祥。其中陈仁麒（1913-1994），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人。1970 年 12 月由炮兵政委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二政委。“913 事件”发生后，与梁兴初、谢家祥一道

了。在一片穷追猛打的喧嚣声中，风云一时的军方势力黯然淡出文革舞台。此前，两派群众代表在反复折腾或奄奄一息、或折戟落马。所谓文革创举“新生红色政权”的三要素：军队、干部、群众代表，最后只剩下重归旧位的“老干部”了。

四川的“大三线”建设是北京高层的一大“心病”，让代表秩序和经验的技术官僚出来收拾“烂摊子”，恢复生产、也让人过点安定日子——就此而言，北京的心病与川民百姓的心病，在某些频次上同步了。

必须承认，四川官场与庶民心气相通的“清流”“贤吏”不乏其人。比如：顶着压力解散公共食堂、分自留地为百姓留一条生路的“邓青天”（邓自力）[1]、冒死赴京为四川饥民告状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集团[2]、比如：比如仗义执言的省官明朗、地区级小吏宋文彬、曾笳[3]……等等。他们为民请命，抵制“左”倾路线，被李井泉一一打入了炼狱。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除了上述值得尊敬的清流，为数更多的官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精神品格始终停留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水准，他们最想要做的，就是对羞辱过他的造反草民实施报复，重享掌权行令的快感。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和作派小心翼翼发起纠偏，旋即被毛泽东认定为明批“极左”实批文革而予以否定。为续接文革香火，让江青一伙再演“借钟馗打鬼”戏码：“批林批孔”，将矛头直指“周公”。那些曾怀报崇高理想投入文革而遭受打击报复者、那些在各种清查运动遭遇迫害者、那些心怀私念而文革际遇不顺者，于是混杂交错，再度呼啸而起。这一次重庆人又占了先机，一个自称“民办‘十大’宣传队”的松散组织，企图克隆八年前解放碑“广播站”两派名嘴夜夜热闹，煽动全城叛乱，合川县的当年“司令”拉一帮人里应外合，分割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地方权力，还有，川北名县广元的造反派还建起了一个俗称“河街政府”的隐形权力机构，与官方分庭抗礼，热

被中央认定为“上了林彪贼船”。

[1] 邓自力任泸州地委书记期间，因体察民情，率先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给农民多划自留地，1959 年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四川的彭德怀”，与和他同受处分的另两位地委书记崔璋、陈怀堂一起被打为“邓崔陈反党集团”。

[2] 萧泽宽原为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原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廖伯康原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罪名是萧李廖等人“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之际……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由此而打为“反党集团”。

[3] 明朗，原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 年省党代会未投李井泉票，1962 年又匿名向毛泽东写信状告李井泉，被群众视为“反李英雄”；宋文彬和曾笳分别为温江地委书记、副书记，1958 年因反对粮食浮夸虚报遭李井泉迫害。

闹一时……

可惜，内乱至此，芸芸草民对文革的激情政治早已淡漠，上述那些零三八碎的喧嚣很快烟消火灭。现实的麻烦是：刚刚出现转机的巴蜀经济持续恶化、企业生产陷于瘫痪、成渝交通枢纽几近堵塞……与此同时，全国烽烟四起，国家面临再次陷入动乱的风险，以周恩来为首的官僚集团不得不发起反击，以“把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名连发“金牌”，制止文革初的乱局重演。毛泽东也敏感觉察到“全面内战”很可能卷土重来，只得紧急刹车，发一个“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最高指示。“批林批孔”无疾而终。

1975 年，由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让川人重新看到希望。

7 月，这位素秉现实主义的铁腕人物接见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邓指出，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菜，就很不安定。他还要求加强管农业的领导班子，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8 月，省委召开地、市、州、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入冬，全省农村上了 100 多万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些措施迅速扭转了四川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总产值和粮食、生猪等产量均有增长。猪肉和粮食比任何神圣的口号都更具诱惑力，难怪当时四川流行一句名言：“邓小平上台，千百万猪头落地。”

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党内政治现实主义者、著名的农业专家赵紫阳，正是在这关键时间点从广东来到了四川就职。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因缘，300 多年前，四川的先人也正是从两广两湖一带万里迁徙，来“填补”了战乱摧毁的巴蜀废墟。

四川民间曾经风传，说先于赵紫阳来川就任的刘兴元，受毛泽东之嘱曾专游成都武侯祠看清人赵藩撰写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既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事实遗憾地表明，始终注意路线正确的刘兴元来川多年，政治上左顾右

盼，行动上小心翼翼，实在无大作为[1]；而同样来自广东的赵紫阳对四川文革的反思、省度与把握，包括对于川人的期盼，都是清醒的。四川在全国的地位重要如此，大刀阔斧实施整顿的邓小平断然换帅，不能不说是灾难深重的川人一大幸事。北京决定赵紫阳到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副担子一肩挑，一步到位。

毛泽东已病入膏肓，作为日落前的回光返照，四川和全中国一道，注定马上还得遭遇一轮劫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初尝权力禁果却得而复失的风云人物，因个人命运与文革命运捆绑太紧，确实必须做最后一搏，可是更多的，早已被乱局折腾得疲惫不堪的芸芸草民只想等待天明；个别勇敢分子甚至不顾一切地豁了出去，公开为文革高奏挽歌。1976 年 3 月 4 日，曾经最先领跑文革骚乱的重庆，一位叫白智清的钢厂技术员在解放碑贴出反对批邓的大字报，大声呐喊“我爱我的祖国!”接着再到省会叫板，公开点名批判文革派理论权威张春桥，把大字报直接贴到成都盐市口。与之同时发生的是，成都的造反好汉重演了一幕 10 年前胁迫省委主要领导上京告状的短暂闹剧。重庆的造反者强行将所有局长拉到到省会“逼宫”……四川十年内乱似乎刹那间压成一个浓缩版。

凑巧的是，上天也来添乱。1976 年 8 月中旬，川西平武、松潘发生大地震[2]。整个成都：当官的、当兵的、有权的、没权的、想权的、闹权的……包括市井草民，引车卖浆者流，一派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于是，历史终于在一个月后在 9 月 9 日突然转向：毛泽东残阳坠落。背负沉重历史宿命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开始走向新生。

无声的嘱托

1984 年夏天，本书撰稿之一周孜仁从边疆公差回渝，与同为八一五事件发起人之一、其时供职于重钢大轧车间的同学吴庆举旧地重逢。吴问他是否还记得沙区公园旁的那片公墓？周答当然。八一五派数百武斗死者就掩埋在那儿。

[1] 刘兴元作风谨慎，加上四川地方工作一直靠李大章全力撑持，到四川后虽名为一把手，实际上明哲保身，无所作为而已。批林批孔后期，全国像刘兴元这样在地方主政的军队干部，陆续回归部队了。

[2] 1976 年 8 月 16 日，松潘、平武之间发生 7.2 级地震。地震属震群型，主震之后又发生 22 日 6.7 级地震和 23 日 7.2 级地震。这次地震有感范围较大，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北至呼和浩特，东至长沙，最大半径 1150 公里。

1967 年夏天墓葬初成，正是炮火连天时。毒日头下一派高高低低的墓碑石柱，刻满呼唤年轻人献身的豪言壮语。类似的公墓，当时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体育馆花台、牛角沱转盘、上清寺街心花园、潘家坪、杨家坪转盘、重庆大学松林坡、重庆一中操场、建设厂河边、工业学校校园、北碚东阳镇……大大小小计 20 余处散落。全四川就更多了，不知几百几千！几年后消除“文革痕迹”，这些零星乱坟全都被铲除净尽。沙区公墓埋葬尸体 400 余，合葬墓 113 座[1]，太多太杂，公园拿不出那多钞票去消除“痕迹”，也不愿无端惹来死者亲属众怒，迟迟无行动。有好事者将“群众意见”投访至四川省委，省委将信转给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文革中被八一五派及重庆驻军认定为“反到底派黑手”的廖伯康，亲自到沙坪公园进行了考察，深感此地对保存历史记忆以警醒后人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会同常委研究，最后决定：“不拆毁，不开放，不宣传”，由市财政拨款两万元，筑墙一围以为保护——一个奇特的历史景观便这样侥幸、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尘封在了闹市中一片寂寞的荒林蔓草之中。是日，仅俩个幸存的文革旧人在苔痕迷离的墓穴间流连，任山城夏日的密雨将全身淋得透湿。

如今，这座全中国唯一幸存的文革墓园已名满天下，重庆市政府将墓地认定为“市级保护文物”[2]。难堪的是，30 多年过去，这个占地区区 3000 平米（4.5 亩）、仅有几百冤魂的可怜安息之所，在雄踞 960 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辽阔国土上却越来越难以容身，人们真担心某一月黑风高之夜，它会被当局将它悄悄地铲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是当代中国，为什么偏偏有人害怕这段属于他们自己、同样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呢？这段历史是由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的胜利者自豪的执政者自己发动，并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煽动全民（包括躺在荒林泥土下这些年轻的亡灵）疯狂卷入的。本书作者都是四川籍人，他们的青春年华正是被蛊惑人心的号召卷进了这段历史，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让他们的人生道路突然中断或永远转向，于是和无数“普通人”一样，去

[1] 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晓文、及曾钟等长期从事沙坪坝文革死难者墓穴的勘测、调查、研究，著有多篇论文，本文所采用数据，均摘自陈、钟论文。

[2] 1985 年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得知对重庆沙坪公园内文革中八一五派所建武斗死者墓地有要求拆毁的意见，到现场调查了解后，向市委常委会报告并做出决定：拨款两万元修围墙保护起来，采取“三不”措施：不开放，不宣传，不拆毁。2009 年 12 月 15 日，该墓群被重庆市政府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感受一种超越生活之上的所谓崇高的目的和意义，还有虚妄的激情与浪漫……他们都深感这一段个人历史的荒唐和可笑、可悲，但却决不愿回避，相反，他们认为，恰恰是这段遭遇成全了自己人生刻骨铭心的一次启蒙，使他们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关于既往，关于现在，也关于未来。他们同样认为，一个自信的国家、自信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也应该采取这个态度，不要回避，更不应刻意遗忘并逼迫自己的人们遗忘。恐惧自己的历史是胆怯、甚至是滑稽的。以为回避就可以变得聪明，不仅愚蠢，尤其可耻。

正因为此，我们走到一起，开始了这个应该由历史学家来完成的工程。我们坚信，这项工程对于国家、民族、个人的历史，都是有益的。

【读书与评论】

读李辅《寸心言不尽》琐记

孙 涛

近日，李辅先生来访，赠我一本他最新编辑刊印的作品集《寸心言不尽》。

李辅先生 1939 年生，山西应县城内人。曾在山西农学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习。1964 年 7 月毕业后，分配到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1971 年 11 月开始，先后任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省委农村政治部、省农办副主任，襄汾、平遥县委书记。1999 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所思所忆七十年》《李子吟》《六年芝麻官》《老酒新醇凑一壶》等。

关于新编辑刊印的《寸心言不尽》，李辅在自序中说：“这本书，并非我的个人传记，无意于自我标榜。书的主体，是那三万余字的人民评说——它们是本书的灵魂，是历史最有力的注脚。我将其精心整理呈现，如同捧出一颗颗赤诚的心。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真正的政绩，刻在百姓的心坎上；不朽的声名，活在人民的记忆里。时间是最公正的筛子；民心是最永恒的碑文。四五十年的光阴流转，淘洗掉多少浮名虚利，却沉淀下这份真挚的情谊与评价，其价值何其珍贵！”

李辅先生曾在襄汾县和平遥县，担任过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先是在文革后期，谢振华主政山西时，李辅被省委安排在襄汾县担任县委书记。“四人帮”倒

台后王谦主政山西，搞了场倒清查和清查扩大化，李辅被清查，被打成襄汾县帮派体系的“头子”，十一名县委常委中的八人，二十二名部长中的十四人，以及一半以上局级干部，还有许多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被打成“四人帮”在襄汾县的“帮派体系”。

党中央纠正山西倒清查和清查扩大化的错误，将王谦调离山西，派霍士廉主政山西后，李辅被彻底平反，又被省委安排到平遥县担任县委书记。李辅在平遥县积极推进和落实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新政策的践行者。1981 年 11 月 15 日，省委书记霍士廉专程到平遥县，召集县里四大班子成员开会，讲到这一年 5 月他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专门以李辅作典型，说李辅同志文革初期造过反，但没有参与打砸抢，本人有工作能力，在基层干得也不错，像这样的干部该怎么办？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和中组部赵际清副部长等首长当即表态：像这样的同志，仍要作为我们党的优秀青年干部来培养。

但到了 1985 年，霍士廉调走，省委书记易人，李立功开始主政山西，在清理“三种人”时，李辅却被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这种巨大的政治波折并没有击垮李辅，他也曾为自己遭受的委屈和不平鸣冤上访，但更多的是坦然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中这种委屈和不平，相信百姓能辨忠奸，青史能鉴是非。正是这种大胸怀，使他在 70 岁时，完成了一部大作《所思所忆七十年》。人生难免会进入低谷，而在低谷中不自暴自弃，能反思人生剖析历史，写出一部民间信史来，证明了李辅不俗的定力、魄力和能力。而今，在进入奔九途中，李辅又编着出《寸心言不尽》这部文集，对自己和历史，做了又一次总结。

自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后，郡县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彻底取代分封制下的地方割据。县级政权是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关键纽带。延续至今，县委书记成了中国官场能臣干吏一个施展才干的重要职务，也成了中国官场能臣干吏向上晋升的重要环节。李辅在两地出任县委书记的历练中，实现了报国为民的情怀，干出了造福一方的政绩，也遭遇了被无妄之灾逼出官场的结局。几十年过去，他不再是地方官员和公家干部，而成了一介布衣和民间学者。在历史面前，官家的提点已成浮云，百姓的口碑重若千钧且历久弥新。这些来自襄汾、平遥的群意民心，汇聚于此书之中，铸就了这位被“双开”的县委书记的人生铭文。

这本书也包含了李辅的一些回忆与思考。我先将其中三篇推荐给朋友们。一篇是《吴象引领我上行》，李辅用感恩的文字，写出了吴象对他的帮助和引导，最后动情地写道:“四十多年来，老吴象教我做人做事，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我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人生的向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他给我提出的目标，指明的奋斗方向。做中国人易，做到堂堂正正难。堂堂正正，本质要求光明正大，大公至正。我可欣慰地向吴老报告，我在襄汾和平遥的工作，群众送匾写道仰不愧天，俯不愧民，已经得到百姓的认可，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余生晚年，已无奢求，无欲则刚，保持晚节，不会意外。您在九泉之下，安卧静息，尽管放心吧!”

另一篇是《学大寨变奏曲》。他以反思的文字，写出与大寨这个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的实际接触中发现的种种问题。李辅从切身感受中如此总结道:“大寨，是山西人爱恨交加的一个地方。它曾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人们赞赏，努力学习；文革中，它变成一根棍子，敲打农民，欺负农民，弄得农村民不聊生；后来，它成为革命不革命的划分标准，整得山西广大干部死去活来。农业学大寨不断在变，变得令人恐怖，走向极端，终于被历史抛弃。”在襄汾县委书记任上,李辅也曾虔诚地学习过大寨那一套。在他对大寨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中，在自己的亲自调研和实践中，他渐渐对大寨这个典型的变化，有了真切的认识。《学大寨变奏曲》一文，真是奏出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的千般苦涩，也奏出了他们学大寨运动中的万般滋味。

还有一篇是《我接触过的山西省委六个第一把手》。李辅写道:“我从 1964 年到山西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经 1973 年任襄汾县委书记、1980 年任平遥县委书记，直到 1984 年免职，二十年内因工作关系，接触过山西省委六个第一把手（先是第一书记、后是书记），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觉得有趣，很想写成文字。回忆与他们的接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对他们总体的叙述和评价。他们都已过世，中央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盖棺定论，我不去肯定和否定。我写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只鳞片爪，窥豹一斑，从中也可能看到一个领导者的特质和特点，也可能观察到这些领导人的时代烙印，也可能体察到他们的风格和风貌。这些高官，凡人高不可攀，其实他们也是人，揭开神秘的面纱，可以看到真实的面目。”

当年在省委机关任职，到后来做了七品县太爷主政一方后，李辅有机会在不

同场合面对面地与省委书记打交道，那时，毕竟是上下级，这些高官还变不成他笔下的人物。而今李辅已成了一介布衣，当这些封疆大吏变成他笔下的人物时，他便可以平视甚至俯视他们了。他们不再是主席台上做报告、办公室里下指示的模样了，读者们可以从李辅打开的这扇另外的窗口中，了解到这些高官们的故事。

先贤傅山先生在《霜红龛》文集的一则“杂记”中，对后人留下如此教诲：“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后非底，有先非后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于前，我其是而去其非。”经过宦海磨难，又经过退休后多年的思考笔耕，李辅先生早已练就了傅山先贤所说的“一双空灵眼睛”。在山西的民间信史宝库中，李辅先生的《所思所忆七十年》和其后的几部著作，都是“我其是而去其非”的精彩篇章。当年为官造福一方百姓，晚岁著述硕果留存史海，如此人生，当可无愧天地良心了。

【评论】

《四川文革史》读后

袁庭栋

盼此书问世已有数年，如今终于盼到了，不能不写上几句，否则心中总觉得欠缺了什么。

发生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那场在人类历史上既空前又绝后的、对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后来人实在无法理解甚至无法相信的文革，不应该遗忘，不应该回避，应该关注，应该讨论，应该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的第一人口大省的四川文革应该关注，应该讨论，应该研究，也是毫无疑义的。为什么？理由可以有若干条。我心中常常默念却只有一句在我国民间流传多年的民谚：“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语出《增广贤文》）。我一直认为，愈是久远的民谚，愈有大道存焉。

我当然知道，当下的我辈，要研究和撰写历史，很难；要研究和撰写现代当代历史，更难；要研究和撰写文革历史，那是千难万难。

但是，此书的作者和他的伙伴知难而进，不顾千难万难，克服了千难万难，花了几年工夫，终于完成了此书。值此时刻，说什么祝贺祝福之类的言辞，都是

淡而无味。我只想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当年文革的过来人，一个 85 岁的老人，我如愿了，我们终于可以给后人一个交代了。

我不会说此书写得有多好，因为主客两端的条件都不允许能够把这样的书写得有多好。不允许，绝对不允许。我也不会同意此书中某些分析和评价，因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要让若干个有思考者对于文革中那样多的史无前例的人和事都有相同的分析和评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认为，此书对于文革中那样多的史无前例的人和事在史实上的叙述是尽可能真实无误的，很可能有的某些失实那也是出于史料的失收或误载，而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曲笔。这就够了，历史研究的第一责任是留给读者无误的史实，特别是文革这样有如万花筒一般的诡异的岁月，能够留给后人无误的史实，那就是成功。至于对于若干人和事的分析和评价，只能是见仁见智，一家之言，献芹献曝，仅供参考。

而且，我还有一种比较固执的看法，我认为，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在分析和评价文革中的人和事时，要想完完全全不带有一点点感情色彩是很难做到的，我知道我自己就很难做到，因为当年的烙印是太深了，太痛了。要完全客观而公正地进行分析和评价，只能交给下一辈人。因为，我们的四川老乡苏东坡早就下了结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出于以上的理解，我盼望着能有那样一天：文革历史可以回忆，可以讨论，可以研究，可以书写，相关档案可以查看，研究成果可以出版。那时候，新一代学者一定会写出并出版更新更好的研究四川文革历史的著作，不仅有史，甚至还会有大事记、长编、人物传、画册、词典、资料选辑……。我盼望着，盼望着，虽然这一天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到来，但是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评论】

一份来自六十六年前的检讨交代和整风小结

谢阳秋（澳）

母亲六十六年前“交代”（以下简称“交代”）和整风小结（以下简称“小结”），将笔者带入了那个非常陌生但又似曾相识的年代。

说它陌生，是因为即使笔者到了古稀之年，仍然无法走进那个年代严酷的

政治场景。相关研究的文章和成果很少，亲历者的描述更为稀缺，尤其是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中共在全国干部中所进行的反右倾运动，更是鲜见。只有儿时的记忆中，父母亲老是开会，而这会总是开到很晚，经常是我们睡觉了还不见他们回来。

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检讨、接受别人的批评（批判），压力之下一遍遍做出“深刻检讨”，仍然难以过关，也是文革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不管是“走资派”，还是“516”，“清理阶级队伍”，无一不是这种模式。不同的是，文革前较少直接使用暴力，但精神上的暴力丝毫不差；而文革中的暴力则往往比较直接，比较血腥。

正因为感到这一段史料的空白，笔者不惮披露一些隐私，将其公布出来。

从“交代”和“小结”的内容看，母亲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有下面几条：

第一是人民公社化——尤其是在城市搞的人民公社化，即她在“交代”中所讲的“共产主义大院”——的不满言论。这个运动之初，母亲还是非常支持、积极参加的。她主动停掉了家里的“小伙”，让全家都去吃“公共食堂”，还动员家里的保姆也参加了公社。但是，很快就感到不大对劲了。“由于食堂人多、排队、拥挤，有时吃不上热饭时，就产生了大火【伙】不如小火【伙】，觉得不方便的思想。”

另外，那位原先帮助做家务的保姆，被公社分配做炊事员，保姆不愿意，回了老家。可我家孩子多，父母上班工作忙，衣服没人洗，袜子鞋破了没人补，母亲也不满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叫起来了，建议公社解决这问题呀不然可不行呀”。

回到当年的环境，庐山会议之前，发发牢骚、表示点不满，好像还有点空间。但是，到了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这就成了典型的右倾言论。

第二是对市场物资缺乏的不满。用她在“交代”和“小结”里的话：“市场物资供应上，对别的东西没感觉。对糖果、对肥皂，有感觉。小孩要吃糖买不来，肥皂买不来，就不满意”。“看到了某些商品供应紧张，虽然自己也知道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后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的发展一时赶不上需要，但是又猜详【想】是否是出口多了（特别是肉食和蛋品）”。

关键在于“不满意”三个字。那年头，不满意，就是怀疑乃至反对大跃

进，妥妥的右倾言论。

第三是作为省工会的宣传干部，参加了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去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的参观。一方面，她对社员们的积极性和干劲赞叹不已——没有鼓风机，就自制大风箱，两个人拉；老人孩子都踊跃去河里捞铁砂。这样的干劲是以往所没有见过的。当然，她不知道，他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县委为参观者专门安排的。但是，当她真正看到这些土高炉炼出的“铁”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这跟个刺维【猬】一样，这里有多少铁呢？这能不能炼钢。”

毫无疑问，这也是典型的怀疑大跃进、怀疑大炼钢铁的右倾言论。

第四是农业大丰收问题。1958 年 7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 2 亩小麦创亩产 7320 斤的记录。作为农民出身的母亲，很自然就“对 7000 斤不相信”（交代中的原话）。需要写进“交代”里，应该是她曾公开说过，并被人揭发出来了。

第五个问题是工作中的畏难情绪，因与大跃进无关，省略。

就笔者所接触的史料，这四种言论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被打成“右倾分子”。不知为何母亲竟然能成“漏网之鱼”，混过了关。或许是由于她之前的“革命经历”？或许是省工会的某些领导动了恻隐之心？总之，母亲没有被定为“右倾分子”，也没有由此丢掉了职务——但，再想往上恐怕是没戏了。

附一：检讨交代

这是一份笔者母亲在六十六年前（1959 年）向党写的“交代”【检讨】。她只有初小文化程度，错别字连篇。但我们似可从这份检讨中，感受到大跃进当年的氛围——那个即使我们 70 多岁的年龄也不太熟悉、遑论年轻人了的氛围。这份交代中，【】号内是笔者所加的注解或纠正的错别字；文中括号内是原文中自带的。

原文如下：

我对去年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方面的问题。我是积极拥护的，我认为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不论在生产建设上，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上，以及各项工作上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好得很。但是自己是不是就那么自觉呢？不是这样。在不少问题我是存在错误的和糊涂的认

识的。我今天向党交【代】五个问题。

（1）人民公社化。开始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就是从县人民公社化后的规划，每人吃多少粮，吃多少肉，每人多长时间发尼【呢】子衣服等等。自己感到农村发展真快。这段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

其次就八月份，我们稿【搞】共产主义大院时，自己没在家（在洛阳），看见洛阳稿【搞】的热火朝天，每天锣鼓喧天。我回家中小火【伙】取消了，保母【姆】入社了。后来分配他【她】当炊事员，他【她】不愿意干，我曾动员过他【她】，后来他【她】说他【她】和公社负责人说了，他【她】去开封。后来，由于自己【家】人多，衣服没人洗，袜子鞋破了没人补，自己就叫起来了，建议公社解决这问题呀不然可不行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自己对待人民公社问题，说明了对自己好的，对自己有利的，自己就欢迎。不利的，或产生了矛盾，就不满意，就叫苦，并不是从集体利益上去考虑，也不是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

（2）大办钢铁问题。开始我是在黄委会听刘部长【不知何人】报告，在会上刘部长批判了大办钢铁中的几论几派，

在那时钢铁到底怎么办，是不清醒的。刘部长几论几派的批判，也是理解不了的。这次会后，各厂各社都办起钢铁来了，对自己启发很大，自己就很想有机会去看看，到底铁是怎么炼出来的。

九月份省委宣传部组织去鲁山【河南省的一个县】参观【，】姚主席【时任省工会副主席】叫我去，高兴极了。这回我要看看铁到底是怎么炼出来的。到鲁山后，先看的下汤【乡一级地名】八一炼铁厂，很多炉子是妇女们自己稿【搞】起来的，亲自看到了他们炼，炉子是土高炉，没有扇风设备，自己稿【搞】的大风箱，两个人拉着扇。又到河里去参观了涝【捞】铁沙【砂】的，老婆孩子热火朝天，当时对自己教育很大。看到他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工叶【业】化，没有设备自己想办法，没有技术，他们从实际中学，想到自己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就产生畏难、松劲是不应该的。

第二天又看了庙坡【地名】，三八红旗炼铁厂，看到了更多的妇女去炼钢铁，山上山下是热火朝天，看到了他们炼出来的铁之后（火结铁），认为不如八一厂炼的好。自己就产生了怀疑，自己想，这跟个刺维【猬】一样，这里有多

少铁呢？这能不能炼钢。又到新华厂看，新华是土洋炉，出的铁，又是流水铁。厂长又介绍了建厂情况，感到鲁山办钢铁，县委决心大。真是平地里起古堆【？】。了不起。当时就觉得庙坡炼的铁，不如那两个厂的好。

当时自己有这种思想为什么没说呢，自己很清醒吗，我说也不是，当时就觉省委宣传部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谁也没有说自己也不说。但是当时不说，思想上有这个看法，到了一定场合就要说，如在反虚夸时，和组织宣传部一个小组学习时我就说了。

（3）市场物资供应上，对别的东西没感觉。对糖果、对肥皂，有感觉。小孩要吃糖买不来，肥皂买不来，就不满意。

（4）农业大丰收问题，对 7000 斤不相信，可是又想到我们的党报，不会登假的。另外看到有县里负责人亲自验收。想想这思想就通了。

（5）工作和学习上，工作上也有维【畏】难情绪，总觉得自己不会写东西。

附二：正【整】风小结

如同笔者在母亲上述“交代”中特别说明的，【】号内是笔者纠正的错别字，或简短的批注与感慨；（）号内是文中原有的；标点符号不一一纠正。

一年来，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学习，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的伟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使我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解放了思想，破除迷信，尤其是经过八届八中全【会】【即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的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学习，通过这次新的正【整】风运动和对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批判，使我又受到了一次深刻实际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思想，认清了形势，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革命的继续。

通过这次新的正【整】风运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作用。坚决认真的贯彻执行

党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迅速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强烈的愿望。坚决认真地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只有不断地批判右倾思想，才能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明确了人民公社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主义事业高速渡【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的产生，首先经受了去年大办钢【铁】、深翻土地、特别是经受了今年巨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它不仅没有垮台，而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说明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一产生就显试【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和伟大的生命力。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它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好长的一大段八股文啊！毛在延安整风时曾大力反对“党八股”， 49 年掌权后却听任八股文泛滥，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小结”开头讲的这一大套，应该是中央全会向下传达的精神。】

但是，由于我自己阶级觉悟不高【这才引上正题】，思想的发展赶不上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受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曾在大跃进的胜利形势下产生了一些糊涂和错误的认识。

如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接着又发出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制定了以钢为纲和小土群【即小高炉、土洋结合、群众运动】的方针，全国人民立即投入了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群众运动。我自己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一运动，并且受到了不少教育。但是，当我看到铁的质量不好时，我就发生了动摇，认为这样的铁能不能炼成钢呢？又如去年 11 月份我从焦作【河南省城市】回来，正当天下雨，看到很多棉花掉到地上，当时一方面感到很可惜，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是否因为大办钢铁，农村劳力少了，影响了棉收？

通过正【整】风学习才使我明确了，这种思想的危险性。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动摇了党的以钢为纲和小土群的方针，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唯新【心】主义的【猜想她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怎么回事，只是一味地按照上级传达与部署的调子写】没有把事物看成是不断发展和变化，而看

成是静止的，不变的。直到今年自己亲自看到小土群的变化后【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变化，那些像刺猬一样的铁消失了还是能用了？在笔者看来，只能是在压力下检讨的需要】，就越法【发】体会到党中央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英明，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离开了党，离开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说彭德怀呢？还是在说自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再如对人民公社、市场等问题方面，也是如此。去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自己听了很多领导同志的报告，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自己也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取消家中小伙，参加公共食堂，动员保母【姆】入社。由于食堂人多，排队、拥挤，有时吃不上热饭时，就产生了大火【伙】不如小火，觉得不方便的思想。

对市场问题也是这样，看到了某些商品供应紧张，虽然自己也知道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后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的发展一时赶不上需要，但是又猜详【想】是否是出口多了（特别是肉食和蛋品）以上这些思想充分地说明了，我的阶级觉悟不高，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拍手欢迎，在看到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或妨碍着自己利益的时候，就忘了党的方针政策，忘掉了集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多么危险。

（作者说明：在这份“小结”后面，又用订书机订上了不同纸张写成的稿子。猜想是母亲这份“小结”、其中的检讨、反省，并没有获得通过——那些年，检讨很难一遍就能通过的——故而又补充了一些内容。下面的补充，笔者删掉了一些与大跃进关系不大的文字。）

再以我的工作学习等方面来看，通过上次正【整】风运动，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基本上克服了不安心在宣传部工作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的现象。（怕在省级工作稿【搞】坏了影响大的思想。但是从我的思想深处来检查，不论在思想和工作中不健康的现象，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如在工作顺利的时候就干劲大，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消急【极】就松劲。去年工会闹消忘【亡？】时，曾有一段等待和松劲现象。这和领导上说的要积极工作，为工会消忘【亡】积极工作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作者说明：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工会闹消忘【亡】”的表述，不知道是错别字？还是真有过工会要消亡一说？很快就在“知乎”上查到：“随着大跃进

的开始，以及人民公社的出现，工会逐渐被人民公社所取代。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在《关于县级工会处理的意见》提出，人民公社在农村已普遍建立起来，县和县属工会工作将逐渐被公社工作所代替。”一下子就明白了，母亲所写的“消忘”的确是消亡的别字。看来闹大跃进那阵子，确实有过一段不为我所知的、工会要被公社代替的时间。）

在写材料方面也是如此。自己总认为自己年岁大，文化低，记意【忆】力不强。等等。而不敢也不愿下手，这说明了自己还缺泛【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会又不艰苦的钻，不艰苦的去学怎么能会呢，根本问题是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安兔【逸】享受，不愿继续艰苦。

【此处删减了“小结”的部分内容】

由于以上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学习上也是缺泛【乏】苦学苦钻的精神，因此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提高的不快。

从我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来看，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严重的，维我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虽然我在党的多年的培养教育下，有不少进步，但是从以上事实来看，我的资产阶级的唯新【心】主义的思想和观点，未有得到彻底改造。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我出身于旧社会，出身于小农经济的家庭，思想狭隘，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只看到近的看不到远的，只看到自己看不到正【整】体。

二，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消灭了敌人之后，对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缺泛【乏】应有的警惕，因此在工作中产生了不自觉的自满情绪，力争上游的劲头不足。

今后努力方向

经过这次的正【整】风运动，我在党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下，提高了觉悟，初步的划清是非界限。今后必须坚决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党的各项正【政】治运动中，加强思想改造，加强党性锻炼。具体意见如下

一，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苦钻苦学，不断提高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二，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政治运动，不断的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作风，虚心

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

三，加强叶【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办事能力，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四，积极参加机关或公社组织的劳动，卫生等活动。

五，积极学习文化，根据我的工作特点，和同志们订师徒合同。争取一年至两年，学会初中汉语语法。

（“小结”的行文风格，几乎与我们熟悉的文革检讨如出一辙。先是戴一顶“大好形势”的八股文大帽子，继而列举出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将这一切归咎于“资产阶级”。再往后是自己的转变，今后努力的方向云云。）

【序跋】

《地方文革史丛书》总序

敞 之

地方文革史研究是《记忆》2017 年启动的学术项目，原来的计划是，在文革结束六十周年的时候，推出十个省区的地方文革史著作。事实证明，这一计划完全脱离了“厉害国”的实际——当时答应承担这一项目，并且落实到专人的只有四个省区。而在六十周年到来之际，真正完成的只有两个半——除了云南文革史和四川文革史是这期间完成的之外，山西文革史稿则是由 2014 年自印的《文革在山西》修订而来。

在后毛时代，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他们面对的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首先，最有能力承担这一项目的群体被排斥在外——当局明令禁止专业人士研究文革，学术刊物拒绝刊发相关文章，国外的学术会议不准参加，国内不准召开相关会议。这迫使大学师生、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们不得不远离这个领域。

由此一来，这个项目就历史地落在了一批民间学者的肩上，而多头多面多层级的联合管控也使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扣压书刊，检查信箱，监控微信，上门查没，警局约谈，不断地警告你：你的研究成果将会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将会成为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你的书不准在国外出版。与此同时，你的子女亲属也会遇到麻烦，为保住工作，他们不得不按照有司的意志做父母的工作。

如果你仍不屈服，他们就拿出撒手锏——断你退休金和医保。

这些人的遭遇和处境，勾勒出一种史无前例的“浮世绘”——古稀老者，长年出没于闾阎坊间，搜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八旬翁妪，写作校对，不舍昼夜。七旬作家，白天在摆摊卖煎饼，晚上回家核对史料。……这些人，相距千里，从未谋面，但心志相同——要在告别人世之前，完成对地方历史的记录和写作。而在他们的房前屋后，隐现着国安、国保、公安的警车，出没着扫黄打非办、文化执法队的形迹，闪动着党委办、保卫处、宣传部、社区保安、居委会主任的身影。

就在这种险恶之境中，他们用传世之作创造了人间奇迹。这让我想起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夜间人”与“厨房政治”，想到苏联那些自由思想的写作者。他们以耳语为剑，化笔为刀，将地下刊物作为掩体，或检讨历史，或批判时政，或忆昔述往。斯大林时代的暴政和罪恶尽现同胞眼底。中苏对比，中国的特色赫然在目：散落在城镇的退休工程师、老年农民工，秉持着以史为鉴的传统，在现代科技预防性管控的网孔之中，站在改开的打卡地与“六四”的斑斑血迹之上，以草根之躯，普罗之笔，书写着对历史与道路，主义与制度的思考。

毫无悬念，百年之后，这个“浮世绘”将以各种艺术形态，摆放在国内图书馆的外借书架上，出现在中国历史和艺术博物馆之中。

《记忆》以一己之力启动这个项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成果鲜薄，却也创造了极权之下民间撰史的奇迹。那些远离“朝廷之显学”的“二三素心人”，冒险犯难，“虽千万人吾往矣”，将他们孤独而坚强的背影投射到“新时代”的背景之上。美国华忆出版社宁负债而存诚信，舍实利而取大义。为纪念文革发动六十周年的书籍提供免费服务。此三者，以各自的低端孱弱，诠释着“文化自信”的真谛。

【序跋】

《四川文革史》跋

周孜仁

我查了病历表，时间是 2019 年 12 月，我步行回家，动作忽发异样——用工业控制专业术语表述，就是“指挥系统”与“执行系统”忽然脱节：腿脚越

动越快，而我的头脑完全不能调节，不可控的腿脚加速到马路中心，意外终于发生：整个身躯狠狠砸了下去——幸好倒向侧面而非正面——此前不久，我刚采访过的四川大学风云人物：八二六战团团长游寿兴，也是脑梗倒地，三天后便被上天宠召而去。我砸地瞬间似有神佑，侧倒，未伤及头颅，我还能顿然蹦出一个几乎本能的念头——四川文革史的撰写刚刚开头，已整理好可用以编辑的几百万文字还留在电脑硬盘、许多历史人物还等待我去采访、更多思索与认知还在脑子里发酵……这些，我都该交付给谁？

幸好，命运让我挺过来了，三个月后，竟然可以用十分困难的姿势操作电脑。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司马迁刑余著述、曹雪芹“瓦灶绳床，举家食粥”，甚至还有顾准咳血、啃着冷馒头在古希腊的文字原野探寻社会前进之路、还有荷兰圣哲斯宾罗莎终日在打磨镜片的尘灰中思索人类伦理……在他们面前，放弃和懒惰都是可耻的。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云：“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加审视，情况则更糟。未经审视的历史除了只会毫无意义的更迭、反复，还注定会萌生新的、更大的灾难。文革是中华民族的劫数。它改变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作为亲历者，我们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并加以审视。也许你应付不了当下的生活，也要用一只手挡开笼罩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都十分重要。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因为要追求时间产生的距离之完美而延宕岁月，只能尽可能跃升认知的高度让自己看得更多、更全面与准确。我确信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个信念让我坚持了下来。当把这部文稿最后一行字敲完，我感觉人生交付的使命终得完成。此生纵饱经忧患，厄运连连、遍体鳞伤，吾值矣！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此书的每一次耕耘，都有很多朋友给我无私的、让人永志难忘的支持和帮助：思想的、精神的、生活和物质的。更准确地说，作为当年文革的深度参与者，我进行的书写，就是当年被愚蠢的政治派别偏见扭曲、甚至生死相向的同代人之间一次真诚的对话、和解、从而共同进行反思的合作。我无法写出所有朋友的名字，只需要提二位：袁庭栋先生和徐小青女士。袁先生是年已八十六岁高龄的著名巴蜀文化专家，徐女士是退休教

师，他（她）们对本书的一句话、一个标点，都义务做了仔细而精心的校阅。

我必须特别提到我的挚友、有“川西柴进”之誉的彭伟先生——我们彼此都始终把对方视为最好的兄弟——他通身透出古豪侠之气，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不仅在生活上予以巨大的资助，考虑我行动不便，他还寄来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替我八方牵线，让我得以通过网络对当年风云人物进行远程采访（有些则通过陈永迪先生面对面采访后将笔录发我），草稿初成，他又偕陈专程来昆明切磋讨论。我提出，你们做了如此重要的工作，书稿应三人联合署名，此议被彭伟婉拒了——包括在献词里向他表示感谢亦如是——多经交流，他同意我在此记录下对他的敬意——也许这样更好，面对现实国情，这部书稿赢来的不可能是荣誉和利益，而是风险。我决定了以他为例，当一回独行侠。一切都由我来面对吧。

这部书稿出版，我已年逾八秩。上苍应许的时日不多，该谢幕了。庆幸的是，对我遭遇的这个有幸而又不幸的时代，该记录的、该认知的、该反思的、该忏悔的，都真诚地做过了，当上苍召唤那天，我将了无遗憾，与八十年前赤条条来到这多难世界一样，干干净净地离去。

关于四川文革，只能做这么多了。我已尽力。知我罪我，全留给读者罢。

2025 年秋

【人物】

历史学家周良霄、顾菊英夫妇的文革研究

梁幼志

2009 年夏秋之交，我第一次见到周良霄、顾菊英两位学术前辈。他们送给我一本又厚又沉的书《十年文革大事记》，书里夹着一个光盘，光盘里面装的是另外两本书《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和《文革时期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那一年周先生 78 岁，顾女士 75 岁。

我第二次采访他们，周良霄先生又送我两本书《皇帝与皇权》和《传统专制主义批判》。这两本书本来是同一本，因为《皇帝与皇权》的后几章批判了毛泽

东的专制主义，被上海古籍腰斩。周先生只好将被出版社删掉的那几章以《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为书名，自印成书。那一年，周先生 83 岁，顾女士 80 岁。

2021 年 12 月 12 日是周先生九十寿辰，我想出一期《周良霄、顾菊英纪念专辑》，想跟二老要几张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写信，无人回复，电话，无人接听。二老是入了养老院？还是驾鹤西行？无处询问。只知道，二老给李宇锋办的民刊捐过十万块钱，使《往事》死而复生。宇锋是 2016 年 12 月 31 日突发心梗走的，二老的捐款应该在此之前。这是我知道的他们最后的消息。

一、元史专家转向了文革史

周良霄 1931 年生于湖南新邵，1950 年入北大历史系，师从邵循正教授。邵循正是当时中国研究蒙元史的三大学者之一，与韩儒林、翁独健齐名。1956 年周先生研究生毕业，“毕业时才 26 岁，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1957 年第 10 期），令人刮目相看。”[1]他的妻子顾菊英 上海市人，1934 年生，比他小三岁，也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宋史专业的研究生，夫妻二人留校任教。一个教蒙元史，一个整理宋代史料。

人怕出名猪怕壮，周良霄在 1962 年第 4 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成吉思汗》一文。此文呼应了元太祖八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1963 年，乌兰夫要提振蒙古史的研究，向北大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要研究人才，翦伯赞就把周良霄推荐给了乌兰夫。这一年的 12 月，周良宵举家迁往呼和浩特。那一年，周良霄 32 岁，顾菊英 29 岁。

1966 年 5-7 月，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乌兰夫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的头子，周良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乌兰夫的小吹鼓手”“翦伯赞在内蒙的桥头堡”，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历史所。好在周良霄不是官，也不在党，批了一通之后，就被晾到一边。内蒙的运动从反工作组、反军区保皇，转向“挖肃”运动，直到 1971 年唐山学习班结束。周良宵一家“被处理下放到阴山背后的一个小荒村，带两年工资，落藉为农，永不录用。”[2]

没多久，毛泽东交办标点《元史》，内蒙文教办的军代表不得不把周良宵调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1974 年，中央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要恢复《历史研

[1] 蒋维崧：《我认识的周良霄先生》，澎湃新闻，2023-03-02。
[2] 郑仲兵、李宇锋采访周良宵、顾菊英夫妇，载《往事》第 83 期（2009 年 9 月 16 日）。

究》，周良霄又被借调回北京。周良宵知道这是个是非之地，小心谨慎地应付。终于盼来了四人帮倒台。文革后，夫妻二人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八九十年代，周良霄的学术成果陆续问世，《忽必烈》《元史》《皇帝与皇权》等著作，使他成为第二代蒙元史大师。各种头衔纷至沓来。半生辛苦不寻常，此时的周良霄，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待在这个圈子里，各种好事就会接踵而来，大学会请他兼任博导，外国同行会请他出任客座。

就在这烈火烹油的当口，周顾抽身而退。周良宵对同行杨讷说了句狠话："我再也不搞你们的元史了！你们的元史，对我来说，真是弃之如敝屣。"[1] 杨讷懵圈了——你是元史大家，怎么突然把元史推出了门，成了"你们的"？让你功成名就的研究课题，怎么一下子成了破烂鞋子？这位周兄是神经了，还是糊涂了？

三十年后，周良霄的老朋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道出了内情："他虽然搞的是古代历史，但一直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勉。文革开始时，他才三十五岁，群众运动对全社会的裹挟是任何个人都不能幸免的，他只有在'继续革命'的间隙中展开个人的思考，诸如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等等。'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他读报，尽管充斥的是千篇一律的统发稿。他搜集传单，比对分析，加深理解。十年磨一剑，终于使他想通了很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2]

文网恢恢，蒋先生说得隐晦，所谓"展开个人的思考"，其实是周良霄挣脱了思想束缚，对毛时代有了新的认识。所谓"搜集传单，比对分析。加深理解"，说实在点，就是从各种信息中，认识到人民民主之中隐藏着皇权，马列外衣下面掩盖着东方专制主义。所谓"想通了很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说白了，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折腾，他知道了共产主义是骗人的乌托邦，现行的制度反人性。所谓"十年磨一剑"的意思是，文革使周良霄有了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转向济世致用之学的打算。他要通过对文革的研究，"通古今之变"——找出浩劫的源头，揭示中国政治的本质。

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问周顾，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知道专政的厉害。你们也知道整理文

[1] 同上。
[2] 蒋维崧：《我认识的周良霄先生》，澎湃新闻 2023-03-02。

革资料有被查禁和追究的危险，[1]，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周良宵哈哈一笑：你这是恭维我们，要说“偏向虎山行”，我们可不敢当。你说的“虎”指的是三种情况，一是当局对档案资料的严防死守，二是对研究者的监视管控，三是对相关出版物的禁止和抄没。我们的办法是不招惹这些“虎”。比如，我们不去查档案，而是要整理流传在坊间的资料，那只“虎”就管不着我。

当初，我改行搞当代史的时候，许多朋友惋惜，有人还劝我：你看不到档案，研究什么当代史呢？我反问他们：档案就一定是真的，有那么可信吗？[2]

顾菊英插话：我是搞宋史资料整理的。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不假。坊间流传着大量的文革资料，造反组织把好多保密的材料都披露于世。改开后，各种资讯像井喷似的蜂拥而来，高层的政治秘辛和私人生活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平反改正之后把黑材料退回本人，宝贵的日记、笔记、书信在搬迁之中流向了潘家园。我们觉得最要紧的，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免得散落流失。

周良宵接着说：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 年，我和几位年轻的同事，想办一个“一二·一”运动展览，可是不到史料。参加这个运动的老师学生，没有人保留当时的文字实物。我们自己也有体会，文革时，我们也收集了一些传单小报，但是几次搬家都给遗失了。

我发了感慨：看来，守在档案门前的“看门虎”，在你们面前，已经变成了一只死虎。你们在当局的鼻子底下干了二十年，当局也没找你们麻烦，看来当局的第二只虎——对研究者的监视管控，对你们老两口也没奈何。

周良宵纠正我：不是人家没奈何，是我们根本不让他们知道。华亭是北京的一个高档小区，国安不会想到，在这个富人居住的地方，还藏着两个不甘享福的老两口。我们把三室两厅都变成了编辑部，饭桌上茶几上电视台上地板上都堆着传单小报，这是我们从四处搜集来的，第一步得先将它们按日子编排起来，内容相同但版本不同的堆成一堆，内容相近但文本有异的堆成另一堆。油印手写的小报，最让人头疼。有些字认不出来，我们就举着放大镜猜。遇到拿不准的字词，我们要开碰头会。

顾菊英：刚开始编辑整理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编出一部什么样的书，见到什么都有以为有用，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工抄写。我那时从未

[1] 周良宵在采访时说，“这项工作是冒着随时有被官方查禁和追究的危险的”《往事》第一卷，第 693 页。
[2] 蒋维崧：《我认识的周良霄先生》，澎湃新闻 2023-03-02。

接触电脑，资料录入都是出资请别人做的。

我问：你们动手做这件事的时候，想到在大陆不可能出版吗？

周良宵：从动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知道这些成果不可能在国内问世。即使在香港出版了，也要严格保密。要是被文化执法大队知道了，可不得了，人家会上门抄家，不但把所有的书一网打尽，还要罚你几万元。海淀的文化执法大队是个模范单位，人家每年的奖金都是靠罚款来的。

顾菊英：我们是通过朋友，找到香港新大陆出版公司，交了钱出的书。

我：你们的书怎么带进大陆的？我的书被海关没收了三次。

周良宵微微一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显而易见，在这老两口面前，第三只“虎”也歇菜了。

所有的政党都要掩盖本党的丑恶和失败。这是规律。五十年代台湾中学的历史课本，从抗日胜利的 1945 年跳接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准备反攻大陆，把 1946 年到 1949 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全部剪掉。直到七十年代结束戡乱，开放报禁，国民党的劣迹才为世人所知。看来，周顾之书也只能在大陆结束一党专政，才能公开发行。

在搞文革研究的民间人士之中，没有几个人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周顾是个例外，所以一旦入手文革研究，他们就显示出了高度的专业性。我以为系年录只是简单的大事记。看了周顾的书，才知道它是“逐日记事，因事而详，系有关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的一种史书体裁（周顾《文革十年大事记》编者说明）。我不知道什么是“传信录”，看了周顾之书，才知道“传信录”的意思是把确信地事实传告于人。其词源来自《春秋》中的“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周顾将中央首长讲话汇编称为“传信录”，说明他们对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有相当的把握。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八九“六四”之后，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封存文革资料，有些地方图书馆甚至将文革资料毁弃，大批私人保存的资料被扔进垃圾箱。一位副部长悄悄地告诉章怡和，民主党派的档案正在有计划地销毁。周顾二老以“抢救和保存这些已濒于灭绝的原始资料”为己任，以专业的眼光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爬梳，“为后世的文革研究提供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史料。”（文革十年大事记，编者说明）。从六十岁到八十岁，他们为国人留下了这三部大书，为学界提供了最早的文革资料汇编，为学界奠定了研究文革的基础。

向虎而行的不止周顾二人，这是一个群体。北大的胡宗式、章铎、张从，清华的孙怒涛、唐金鹤、胡鹏池，地院的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北师大的方延曦、赵惠中、从立新，人大的李豫生、张宝林、陆伟国等人。他们都是亲历了文革的退休人士。上班时没工夫研究，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或多或少总有点退休金，衣食无忧，把心思全扑在给他们带来无数痛苦和无数困惑的文革上去。

周良霄、顾菊英夫妇不在这个序列之中。他们是三零后（1930 年代出生），大学老五届是四零后（1940 年代出生）。他们比老五届早退休十年，他们的成果也比老五届早问世十年。

三、周良宵的专题研究：毛泽东思想

周顾对严家其夫妇的《文革十年史》很不满意，“除了书本身的架构与内容不尽人意之外”，关键的是“对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批判。”[1]因此，在整理文革资料的同时，周良宵就把毛泽东和毛思想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其成果是《皇帝与皇权》和《传统专制主义批判》。

周良宵认为，毛思想是披着马列外衣，混杂了帝王思想、专制主义、唯我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游民意识、唯意志论等各种腐朽落后思想的大拼盘。帝王思想、专制主义[2]、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周良宵把重点放在人们很少论及的唯我主义和游民意识上面。

青年毛泽东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将心得体会写到了书的眉批上。周良宵从毛的“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的眉批中，发现了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就是极端的“唯我主义”。

周良宵认为，这个极端的“唯我主义”包括三方面：第一，这个世界为我而存在，没有了我，也就不存在什么世界。第二，我的存在就是实现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我的行动。一切都只对我自己负责。第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毛泽东相信，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持者为我，我之所以能存在。就是争斗，争斗就是人生，我生就是争斗，与天地人斗，会让他感到其乐

[1] 郑仲兵、李宇锋采访周良宵、顾菊英夫妇，载《往事》第 83 期（2009 年 9 月 16 日）。

[2] 毛的专制主义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玩弄权术上。他曾教导江青说，“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儿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传统专制主义批判》页 71。作者注，这句话是引用郝怀明的《文革初的中宣部》，载《炎黄春秋》2010 年第 12 期。

无穷。在奋斗中实现自我，我的一切行为和后果，只是对自己个人负责，个人之外的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都不过是随我个人生灭的烟云，我不存在了，他们也就和我无关系了。因此，这些“高大上”的事物，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毛泽东身上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为他的“唯我主义”服务的。

李泽厚把毛的“唯我”，换成了“贵我”。认为“贵我”和“勇斗”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意识和理论主张。”[1]从毛的“贵我”出发，李泽厚发现了毛将道德建立在个体自我的基础之上的“主观道德律”。由此出发，李泽厚得出结论：“这种‘贵我’的人生观及伦理学又正好在新时代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英雄主义既包括下层《水浒》梁山的豪杰，也包括《孟子》里的圣贤大丈夫。而毛的主观道德律，则反映了毛“集圣贤豪杰（帝王）于一身的人格理想。”[2]

事无两样人心别，同一个唯我主义，在李泽厚看来，是传统的英雄主义，是至大至伟的人格理想。而在周良宵看来，则是“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无所不为的兽性遗存”。[3] 毛的政治秘书李锐说，看毛要像看油画一样，远看、中看都不如近看。他跟毛打过多次交道，具备近看的资格。他的结论是，近看毛这个人是一塌糊涂。何至如此？端赖于毛“我只对自己负责”。[4]

游民意识是周良宵分析毛思想的重点，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就充斥着数目庞大的流民群体。其成分有散兵、痞子、流氓、盗贼、乞丐。中国历史二十余朝之革命大多由此发生。游民与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毛泽东自小浸淫于这种文化，毛的父亲就有着流民经历和游民习性与意识，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靠贩谷、贩猪致富。毛年轻时也当过兵，还在洞庭湖区，只身游荡，乞食游学。他的特立异行，反常思维，带有浓厚的流氓无产者的倾向。

游民文化既带有小农本能的落后、保守、愚昧，更表现为人性的堕落、野蛮的复归而极富疯狂性、破坏性。反人类反社会是深藏在他们骨子里的基因。他们以帮会或民间宗教为平台，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行侠仗义是他们的精神纽带，好勇斗狠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劫富济贫是掩盖其非法杀戮的口号。他们讲究除暴安良，而他们本身就代表着极度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126 页，东方出版社，1987。
[2] 同上，第 132 页。
[3] 《传统专制主义批判》第 73-74 页。自印书，2015.。
[4] 王局拍案，2024-8-28，“李锐日记争夺战”。

暴力。他们崇尚原始落后，反对文明、秩序和道德，文化和文化人最为他们所嫉恨，焚书杀人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他们特别热爱“乱”，只有乱，他们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都是著名的例子。

毛热爱这种文化，当奉公守法的人们谴责“痞子运动”时，毛却为这些流氓地痞在乡下的胡作非为大声叫好，称其为“革命先锋”。秋收起义失败，毛上了井冈山，仿效水浒故事，火并王佐、袁文才。毛自命为“红色山大王”，自诩“绿林大学毕业”，他憎恶现代文明，推崇底层文化，蔑视知识文化，仇视知识分子。他无法无天无诚信无底线，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他的“其乐无穷”结合起来。折腾了三十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文革迫害了二千万，株连了一亿人，损失了五千亿。

周良宵把毛身上的虎气，解释成霸气和匪气，把毛身上的猴气解释成痞气和流气。钱理群持不同看法，钱认为，“猴气”是反叛，是突破，是异端。毛泽东思想自身包含着一些异端成分。在思想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对现实存有不满或批判意识的人，常常从毛那里得到启发，甚至鼓励。大陆民间的异端思想者最初的精神教父就是毛泽东。[1] 钱理群的这一发现，来自他对毛时代民间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的研究。

搞文革研究的分左中右三派，左派是官方观点，即按照中央的意思，把毛说成是晚年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但毛仍旧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思想还要坚持。中间派认为，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是一伙的，所谓“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毛建国有功，文革有罪。右派的观点是两个彻底：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中共的主义制度道路。这一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唯意志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集大成，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就是乌托邦的试验场和阶级斗争的杀戮地。中共的历史就是打着马列旗号的又一次农民造反。周顾二老是右派的代表。

四、《大事记》的特色

一般的大事记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之下，记载当天发生的事。周顾的大事记不同，在当天发生的事下面，他们配以相关的史料，这些史料常常是人们不曾留

[1]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第 17 页，台湾联经出版社，2012。

心的。比如 1966 年 9 月 9 日，编者在毛泽东对“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的批示”的下面，征引了这封欧洲极左派的来信——

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丝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德—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的窃窃私语和嘲讽，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奥地利《红旗》）

为了与这封来信相呼应，编者又在此信下面征引了中国驻外使馆如何在所在国宣传毛思想，引起公愤的材料：到人家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往外国人手里硬塞“红宝书”和毛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还挥拳辱骂，有的胆大的拦住蒙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更有甚者，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鼓吹无神论和游击战。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了在工地上竖起“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被所在国禁止，于是就集会抗议，还跟警方发生了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大事记，第 148 页）

看了这些文字的人，不免想到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狼们”——王毅、华春莹、赵立坚、卢沙野和他们的驻外同事。也不免会想到“叼盘侠”胡锡进和以骂美国为能事，又在美国买房子的“司马夹头”。《大事记》让我们鉴往知来，知道“战狼”昔已有之，于今为烈。

与一般的大事记不同，这本大事记多了一个编者按。这本书共十节，共有 170 多个编者按，这些编者按长则上千字，短则十余字。无论长短，都凝聚着编者的思考和感情。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编者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分析。

关于“资产阶级”，周顾告诉我们，这个词“在中共的词典里相同于基督教里的魔鬼”，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与化身。谁都没有见过魔鬼，但现实世界中既然存在着罪恶，与上帝的公正仁慈相悖，这些罪恶便理所当然地是魔鬼的挑唆与玩弄所造成的。对‘资产阶级’一词也一样。现实社会中一切罪孽和黑暗，

乃至自身的肮脏与腐败，一股脑儿的推到它的身上，这是最廉价最便当的自我安慰与统治法术。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究竟是怎么样？他们一直不清楚。”（《大事记》第 164 页）

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前派”编者引用了席宣和金春明在《文革简史》中的论述：“走资派是一个混淆敌我的非科学概念，是一个在内涵上“任意性很大”，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谁也没有能够具体讲清楚的黑帽子。“因此，文革中，党和国家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或者犯了走资派错误。任何群众对领导干部所有不满意的言行，都可以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利用大字报揭露攻击，召开大小会议批判，而且一旦被揪斗，立刻就靠边站。是是非非，都不容分辩。”“事实上，文革后期，真正以所谓走资派定性的人，几乎找不出多少来。” （《大事记》前言）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学术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领域里只有真理和谬误之分，而且它们又都是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与认识水平相关联的。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先导，而真理也不可避免的，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把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们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明显的是对学术的玷污和亵渎。正好表明了毛氏文化革命是一种用政治来灭绝科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暴政。”“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里，90%以上的国人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权威，谁当得起学术权威恐怕都不清楚。我认识一个青年中学教师，在一个县城中学教英语。文革中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学生揪斗，头发、眉毛都被剃光。理由很简单，他的桌头有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能读这么厚书的人还不是学术权威？英语是帝国主义的洋文，怎么能不反动？”（《大事记》前言）

关于“修正主义”。编者有个简短的评论：“一个自命是成熟和郑重的党，大张旗鼓地在世界舞台上大反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是什么，他们却一直弄不清楚。”编者想起了 1990 年前后冰心与胡乔木的一则谈话：著名的中共理论大师胡乔木前往看望冰心。冰心问胡，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很坦率地说，我也搞不清楚。编者的点评是：这大概是胡乔木多年来未曾说过的一句诚实话。（《大事记》第 164 页）

王年一是文革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其文革通史专著《大动乱的年代》受到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记忆》创刊号就是纪念王年一的专辑，民间研究者甚至

把王年一做的剪报也当成圣物供奉起来。有个民间学者写了一篇批评王年一的文章，却嘱咐我千万不要发表。不知道他是慑于王的威信，不敢发声；还是怕官方找他的麻烦。人们有将权威神化的毛病，这种毛病在中国人身上尤为显著。

周顾对王年一有严厉批评：“《大动乱的年代》第 75-77 页上特别表彰了‘老红卫兵’与‘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它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甚至把‘纠察队’捧为反四人帮的先驱者。这对于任何对文化大革命中‘红色恐怖’记忆犹存的人都是不敢苟同的。这种说法，只是为洗刷这批‘衙内’们双手所沾血腥的谎言。当年‘西纠’等组织的高干子弟，正是今天根据遗传法则承掌党、政、军、商要津的大小衙内。”（《文革大事记》第 136 页）

《大动乱的年代》是 1988 年问世的，其理论框架、具体观点和征引史料会随着研究的深化，史料的发现而受到质疑。周顾的批评掷地有声。

历史研究永远在路上，新的史料、新的思想出来了，你原来的书稿再版时就得改。我的《内蒙古文革实录》是 1991 年写完，2011 年出版的，去年我想再版，就不得不动大手术。周顾这本书是 2008 年问世的，那时候，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还没有厘清，原师大女附中的高一三班的学生王友琴，因《文革受难者》一书，一跃成了文革研究的权威，她为吸引眼球，以蒙太奇的手法，把给毛戴袖章的宋彬彬说成是红卫兵的头头，是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罪魁祸首。周顾被王友琴误导，在 1966 年 8 月 5 日的按语中，写出了“在以宋彬彬（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赐名‘要武’，宋任穷之女）为首的红卫兵的皮鞭、木棍下，将学校主要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活活打死。”（113 页）这一严重违背史实的文字。相信周顾二老，如果看到《记忆》出版的师大女附中专辑，听到高一三班班主任艾老师的访谈，会改变自己的看法。[1]

周良霄为《十年文革大事记》写的序言《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周顾二老对文革的总体评价，穿插在大事记中的编者按，是周顾二老对文革人物与事件的分析与评说。这些按语集到一起，就是一本文革评论集。

《历史决议》称文革是“浩劫”，王年一称文革为“大动乱”，杨继绳用“天地翻覆”来形容文革，周顾对文革的定位是“疯狂”“扭曲”“堕落”。我相信，

[1] 《记忆》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间，围绕着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共推出了六个专辑。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做了什么，这些专辑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和冷静客观的分析。.2024 年 8 月 6 日，原女附中初三学生叶维丽采访了王友琴所在的高一三班的班主任艾老师，艾老师严厉地谴责了王友琴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行为。这个采访的音频和文字整理现存北大国史研究中心。

这是周顾反复斟酌后的选择，疯狂指的是精神状态，扭曲指的是判断力的失常，堕落指的是道德纲常，世道人心。周顾的着眼点不是社会，而是人。文革使国人陷入疯狂，使国人忘记了常识常情常理，文革挖掘出人性中最邪恶的内容——背亲、构陷、诬告、嗜血、背信弃义和无底线地作恶之后而不知羞耻和悔悟。[1]

《大事记》成书在胡温时代，如果放到当下，国安、国保、公安、扫黄打非办、社科院保卫处、华亭社区居委会都会轮番上门，喝茶约谈、抄书禁言会随之上演。倘若周顾二老据理力争，那么，有关方面就会亮出他们的撒手锏——停发退休金！

五、周顾之书的意义

北京画院的专业画家，被美术圈排斥的耿玉昆，目睹圈内“房子越换越大，老婆越换越小”“在内靠官僚，在外靠奸商”的乱象，与老伴用了二三十年，步量丝绸之路。将他们画作以每张 299 元的超低价售出。看到年轻人的好评，九十岁的耿玉昆老太说：“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应该担负起启蒙的责任。”

看到耿玉昆的音频，我想起了周良霄和顾菊英。史学圈不是排斥而是拉拢他们，而两位老人头也不回，决然离去，从锦绣升平之乡，来到了这蛮荒险恶之地。校对勘比，沙里淘金，手抄笔写，自费录入，形单影只，寂寞孤独，从六十岁到八十岁，为国人留下了书，留下了风骨，留下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周顾之书 2007 年完成，2008 年问世，它是大陆民间学者以个人之力，动手最早，用时最长，搜集资料较完整的文革资料库。同时，周顾之书也是大陆民间学者完成的第一部具有文革史性质的政治评论集。周良霄长于分析，他在按语提出的某些观点，即使在二十年后，仍旧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他的《浅论文化大革命》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文革简史。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出版的文革资料汇编，有两种，一是美国宋永毅等编的文库，二是周顾编的这三大本。两者多有不同，第一，文库是集体之作，周顾之书全凭夫妻二人之力。第二，文库是有基金会支持的，周顾之书没有一毛钱外援，

[1] 赵园认为，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的文革大事记，题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以“疯狂”“扭曲”“堕落”描述文革，更像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尽管各有一部分事实依据。“（《非常年代》，1966-1976，页 12，注 14）

全靠二老的退休金。第三，文库是商品，你要出钱才能买到。想当初，是在美任教的郭健跑到北京专门找我，来推销文库光盘，是叶维丽替我付了六百美元。而周顾之书是免费的赠品，我采访二老时，他们送给我三套，嘱我送给需要的人。第四，文库有检索功能，周顾之书没有。第五，文库有更新版，周顾之书没有。第六，文库只是资料的汇集，周顾之书中还有大量有价值的评论。第七，文库有传播销售渠道，周顾没有，只能靠口耳相传。

周顾是从近代史所退休的，他们的同事应该很有一些吧？周顾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们的同学、同道应该更多吧？周顾是亲历文革且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与之有共同遭遇的，应该有不下百万吧？都说反思，都说教训，都说殷鉴不远，都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北大除了钱理群，近代史所除了赵园，还有几人像周良宵、顾菊英一样？

钱锺书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百年北大，有投机钻营者，有谀时取荣者，有庸碌混世者，有精致利己者。他们是中国学界的主流。由此，可见周顾的价值。

翻译家董乐山临终之时，嘱咐孩子把他的骨灰带到美国去。周氏夫妇的孩子也在国外，他们是否也会让儿女把骨灰也带出国？我觉得不会，他们要留在中国，等待“家祭勿忘告乃翁”的那一天。

【书信】

许良英、李慎之谈无产阶级专政和"三个代表"

续霜红 选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李慎之致许良英，2001 年 2 月 5 日

倾检《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四卷 p .332-333，1852 年马克思致魏德迈书（3 月 5 日于伦敦）有：“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①阶级的存在

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段话我一直知道，但是因为是文革时由林彪发掘出来的而未予重视。经你提醒才认识到其重要性，真可谓一语中的。我没有认真读过马恩全集，不知马如何实现专政，有何构想，（这点请指教）但从列宁起是比较清楚的（主要是经过党，又过渡到领袖专政）以后又经 Stalin 又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全面专政"而登峰造极。

我一直有个想法，没有 Mar×ism 只有马恩列斯毛主义，我称之为 MELSM ，因为一个独裁的教义，必须有永远不会出错的教皇随时加以发挥或创造，否则就要散架（毛以后教义已经乱了）。现在经你点，看到了出典，可谓大受启发。由此一点即可驳掉一切“新马”“西马”之论。

许良英致李慎之，2001 年 2 月 11 日

在我的记忆中，《人民日报》上大力宣传这段话，是在文革以前中苏大论战发表“九评”的时期，似乎与林彪无关。我从 1940 年直至 70 年代末始终迷信 Mar×ism，自然也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六七十年代在农村通读《马恩全集》时，并没有特别注意专政问题。1978 年回科学院工作，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认识到科学与民主是现代人类文明两大支柱，对照文革时“全面专政”的恐怖经历，自然也就痛恨极权主义的专政。不过，由于长期迷恋 Mar×ism，以为摒弃其错误的和过时的成分，Mar×ism 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1987 年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罢黜，使我心中仅存的对 CP 的一线希望和对 Mar×ism 的一点残余的信念都彻底破灭了。1988 年 11 月，几个民间团体联合召开“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开幕式上我指出： Mar× 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断言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会后照相时，坐在我身边的李锐责问我：“你为什么要批评 Mar× ？”以后在他公开出版的日记上还说我的儿子不像我那样“偏激”。几年后，王若水寄给我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觉得前面部分写得很好，但没有接触政治问题，而最后一节《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是曲解了 Mar×ism，只看到虚幻的天堂的理想，而看不到通向这个天堂的血淋淋的专政之路。张宣三承认他同意王若水的论点，

听不进我的批评意见。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所以要如此美化 Mar×ism，主要是由于缺乏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凡是稍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飘飘然，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不愿剖析自己。因此，自我封闭，夜郎自大，不愿虚心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

你问 Mar×ism 对如何实现专政有何构想，39 卷本的《马恩全集》中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材料。第 34 卷倒有 Engels 1875 年 3 月给 A·Bebel 信一句极为重要的话（这也是 Lenin 《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根据）：“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这清楚地表明，只有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才允许有自由，这算什么“唯人主义”？真是自欺欺人！

关于“三个代表”

李慎之致许良英，2001 年 9 月 16 日

吸收资产阶级入党，在中共是有先例的，如抗战前宁绍保险公司董事长胡应麟是正牌资本家，又确是正式共产党员，不过这样的例子甚少而已。我以为要大规模吸收资本家入党，顶多只要组织部发一文件就可以了，犯不上这样大肆宣传。目前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就某方面实已等于或超过文革的宣传（当然，从“势头”讲，对毛那样的个人迷信至少在目前已不可能重现）。我本着“和平演变”的主观愿望出发，总还希望它在如此大规模的开场锣鼓以后会有什么新的“纲领方针政策”（官方用语）出台，如果能够出台一个“私有化”就很不错了（官方一定是会叫“民营化”），不过，这很可能是我的幻想。

关于“三个代表”，虽然过去没有这个说法，但我们年轻时参加革命时历来都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代表三者，就是再加上几个代表都可以（比如说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最高的人道理想……），总之一切都是最最最。也正因为如此，我从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就再也不用努力学习了。

胡绳本来是一个官方学者，自从 1945 年响应了一下胡风以致挨批以后，就更听话。所以他 1982 年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送我，我连翻都没有翻一下。他一直是一个卫道者，1985 年批王来棣是当然的，只是总算到生命临近结

束的时候还居然有些反思，比起邓力群他们来，还要算好的。我小时候读他批冯友兰的文章，后来把他的三个阶段与冯的三个阶段相比，现在觉得他比冯其实还差得多。一是因为学问少，没有冯那样的学者训练：二是因为他的见识比起冯来还是狭小，不过他始终是一个“本分人”，比起现在胡作非为的高官们，就算是可贵的了。

许良英致李慎之，2001 年 9 月 23 日

关于“三个代表”，我自己 1940 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确也是这样想的。但在 1974 年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迷信中醒悟过来，随后又系统地学习西方近现代史和世界各国现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完全幻灭了。

坚持专政反对民主者要标榜自己是“三个代表”，纯属自欺欺人。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都不允许的文化，是典型的中世纪专制文化，与现代文明完全对立，竟厚颜无耻自诩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权贵们会玩弄时髦的名词，把自己装扮成懂得“先进文化”的，可惜每次总要露馅。例如，1997 年江核心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大谈 Einstein 和“相对论”，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因此，人权和民主也是相对的。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记者给我电话，告以江的访谈内容，要我加以评论。我答；江是不懂装懂，信口开河，犯了双重错误。首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而实际上是绝对论。相对论的前提“相对性原理”是：自然规律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任何观察者都是一样的。其次，人权和民主理念，是人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体现；由于人性基本上是共同的，人权和民主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不存在所谓“相对”的问题。

昨天和上周听到你对法国国际广播公司关于“三个代表”的谈话，说对此持“谨慎的乐观”，我觉得你太天真了，心肠太软，难免为终年不绝、铺天盖地的甜言蜜语所动。我则学鲁迅那副铁石心肠，用冰冷的解剖刀来剖析自己，也剖析别人和一切。记得两年前你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生活在“谎言世界”，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直至今日都是“专制主义”，真是掷地有声。“三个代表”提

出后，是否情况改变了？我根本看不出有丝毫好转的迹象。相反，我看到的是：对人权的侵犯更严重，对意识形态和出版物的控制更严酷。政治情况是明显的倒退，看不出一点可以“乐观”的地方。那个被海外媒体吹捧为“开明派”的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据说起草人有张显扬），文末已清楚表明：“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搞多党制”，“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不能搞军队国家化”，“决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是政治民主化”。这个潘岳，1991 年 9 月曾搞过一次臭名昭著的太子党政治纲领《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我至今仍保存着，你如想看，我可复印一份给你。时间过了将近十年，其基本思想还是老一套。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你接受法广的访谈中，对邓小平的评价也过高了。你说他的两大功绩，我认为都不能归他一人。“对毛泽东的批判”，文革后党内外一致强烈谴责毛泽东的反人民的罪恶，从 1954 年开始他不仅没有干过一件好事，而且制造了三次民族灾难，可是邓小平硬说他的功过是 7：3（所谓三七开），这算什么批判？至于“市场经济”也不是邓小平 1992 年提出来的。1986 年党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早已肯定了市场经济。几年前新华社有位记者发表回忆文章指出，连“改革开放”这个名词也是胡耀邦于 80 年代提出来的。当然，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重大贡献的，但这些贡献加起来也抵不过他于 1989 年一手造成的六四大屠杀的反人类罪（这是他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和 1987-89 年两年半内一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恶行。你在两年前的文章中对伪造历史痛心疾首，我完全有同感。被官方千方百计掩盖的十多年前的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我们怎能遗忘？……

李慎之致许良英，2001 年 9 月 28 日

我对孙中山本来知之不多（其实我对什么也知之不多），看了以后很有启发。至于胡绳则他能写这么一封信，在当时已较难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 1982 年送给我的，我根本未看，就是因为他的观点未变。我在文革中，对冯友兰也是痛心疾首的，后来拿胡绳与他相比，当时有点等量齐观的意

思。半年多以后再看，觉得胡的反思实际上比冯还是差得多，这是因为冯的学问是胡根本无法相比的。另外冯毕竟是喝过大西洋的水，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后那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我当时也只怪他言不由衷，但现在再看，把毛的一分为二说成是“仇必仇到底”；又说“洪秀全如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历史要倒退几百年”。实际上就是指的当今，而且他隐隐指出中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都比小他 20 岁的胡绳高明得多。而且那还是大批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年月，一个 90 多岁惊弓之鸟的老人说的话啊！

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

应法广采访，对我虽非第一次，但确极稀少，我现在是想争取多一些发言机会，总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这一次，我的想法是，如此铺天盖地宣传确实少见，要使这样的宣传不至于完全出乖露丑，总得“在帽子里变出个兔子”来吧！资本家入党实在犯不上这样小题大做，我看也许有实现私有化的可能（当然，名义上还是只能叫民营化，决不会承认私有化的）。我所以这样叫一叫，当然不是为当局鸣锣喝道，而是希望能给国人一个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和平演变”。不过由于当局一动不动，我觉得如果能先实行私有化，也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点社会基础。至于政治上当局正在不断收紧，我的文章大概已无在大陆发表的可能，我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已经老了，物质地讲，我们是最少可怕的人，现在老人都越来越衰退，我胆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已。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完全靠谎言维持呢？

许良英致李慎之附件：林牧[1]2001 年 10 月 5 日致许良英信

共产党不能代表“先进文化”，你已讲得很透彻了。它也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在机器生产时代，马克思把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看作“先进生产力的

[1] 林牧，1927 年生，陕西省安康县人。1960 年代初，胡耀邦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曾任胡的秘书。1980 年代初，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国家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9 年，因同情六四学生运动，被开除党籍。

代表”。列宁后来又把他们限于“有文化的工人”。现在，知识、信息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自然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先进理念的知识分子了。

现在的共产党也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是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中办和公安部的“敌情通报”把工人、农民集体请愿和集体上访都看作“敌情”，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敌，怎么能够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呢？！

你谈到“篡改历史”，我再补充几条历史资料。“改革开放”确实是耀邦首先提出来的。“三个有利于”也是 1983 年 1 月 20 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个讲话中，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不要改革的片面改革的观点。提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同时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胡乔木组织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在同年 2 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陈云和胡（乔木）、邓（力群）、姚、宋还为此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特区，也是在耀邦主持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定的。陈云、胡乔木攻击特区是“租界”，邓小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表态。一年后，邓才带着王震视察深圳，表示支持。1983 年 12 月 13 日，耀邦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是“有人用封建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

1986 年 11 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十三大指导方针时，耀邦作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精彩发言。他说：“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主义以后，特别是五四以来，世界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验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和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治。这些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在此之前，耀邦在接见法国一位领导人时说：多党制也可以在中国试一试。共产党可以参加竞选，如果人民不选共产党，那就说明人民不拥护你了。可惜我的许多材料都在两次抄家中被公安部门没收，找不到原话和谈话的时间了。

请看耀邦当时的思想，比之邓、江不知要高多少倍！

（选自《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同心同理书屋自印）

【编读往来】

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向继东谈《四川文革史》

周孜仁先生写作路子宽，著述颇丰，小说、历史都有有份量的著作；虽年过八旬，依然文思泉涌。其新著《四川文革史》采用史景迁式的修辞，一反一般史书刻板拘谨的叙述方式，熔真实性、故事性、生动性于一炉，复盘各类事件现场、记录各色人等面貌，令人有身临其境、伸手可触之感。对当时的各种坊间传闻和似是而非的流言，他都给出了有理有据的澄清。

全书史论结合，有述有评，可读可诵，是一部关于四川文革全面、完整、立论严谨的历史著作。可以这样说：它将成为撰写地方文革史的标杆，五十甚至一百年内，恐无出其右者。周孜仁先生能写出这本巨著，不但需要学识才华，更需要胆气。所谓“才学识胆”。很多人以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为理由，放下了手中的笔，说穿了，他们是没有这个胆气，是贪恋体制的奶酪而不敢动笔，要不何来五十年一百年的。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jiyi.bjb@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